

保安局檔號：ICSB 15/06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委員會

對所提事項的回應

本文件載述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所提若干事項的回應。

第 2(1)條：“數據監察器材”、“監聽器材”、“增強設備”、“視光器材”及“監察器材”的定義

- **請提供資料，說明香港執法機關使用的數據監察器材的功能，並考慮就香港執法機關使用的數據監察器材進行簡報會。(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 **請提供有關增強設備的實例，以及解釋此類設備對截取通訊或監察行動目標人物的健康所造成的影響(如有的話)。(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把視光監察器材納入政府當局就香港執法機關使用的數據監察器材而提交的文件或進行的簡報會中(如有的話)。(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2. 當局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五日舉行簡報會，向有興趣的議員講解各種監察器材及增強設備的功能。

- **請考慮以類似“器材、程式或任何其他方式”的字眼，對“數據監察器材”定義中“器材或程式”一語作出修訂。(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3. 條例草案訂明，“數據監察器材” —

“(a) 指用作以下用途的任何**器材或程式**：監測或記錄向任何資訊系統輸入資料或自任何資訊系統輸出資料；但

(b) 不包括視光監察器材”。

4. 就關乎資訊系統方面而言，“器材”指硬件設備，而“程式”則指供處理器執行一項工作或多項任務的軟件。這兩個詞語全面涵蓋以下兩種運作模式：(a)附加或連接一件硬件，以監測或記錄資料，及(b)藉安裝動手或更改控制軟件的其中一部分，以複製或轉送資料。因此，並無需要作出建議的修訂。

- **請考慮把涉及植入或吞入人體的監察器材從條例草案中剔除。(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提出)**

5. 未經有關人士同意或沒有明確的法定授權而植入器材，並不合法。條例草案未足以構成足夠權力，授權進行這種行動。因此，建議所作的剔除並無必要。

- **請考慮應如“監察器材”的定義(c)般以規例訂明新增的器材類別，或是藉修訂主體法例訂明有關事宜。(在二零零六年六月的會議提出)**

6. 正如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擬備的文件(立法會 LS82/05-06 號文件)所載列，多項現行法例條文容許以附屬法例方式修訂主要法例某些定義的範圍。我們現時的建議，符合這既定方法，而這安排會讓我們因應新的科技發展修訂有關條文。有關規例將會受立法會審議。

第 2(1)條：“資訊系統”的定義

- **請提供其他本地法例所訂有關“資訊系統”的定義，並考慮參照該等定義對有關“資訊系統”的定義作出修訂(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7. 正如我們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解釋，香港有多項法律條文採用“資訊系統”一詞，例子包括《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應課稅品條例》(第 109 章)及《儲備商品條例》(第 296 章)。我們的用意，是除了慣常所指的“電腦”外，還包括例

如電子個人數碼助理等其他器材，使公眾能夠獲得更廣泛的保障。以我們所知，有關當局在擬備《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 章)中“資訊系統”的定義時，已顧及在有關情況下國際上資訊科技方面的最新發展。

8. 就“電腦”一詞，某些條例有對該詞作出界定。例如在《證據條例》(第 8 章)第 22A 條中，“電腦”一詞被界定為“任何用作儲存、處理或檢索資料的裝置”。在《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26A 條以及《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第 19 條亦有對“電腦”一詞作出相類定義。除此以外，其他法例普遍沒有就“電腦”及“電腦系統”下定義。

9. 鑑於委員的關注，我們建議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藉電子方法”的字眼規範“資訊系統”的定義。這樣應可清楚顯示，資訊系統的提述是指常人理解為電腦和相若的電子器材。新的定義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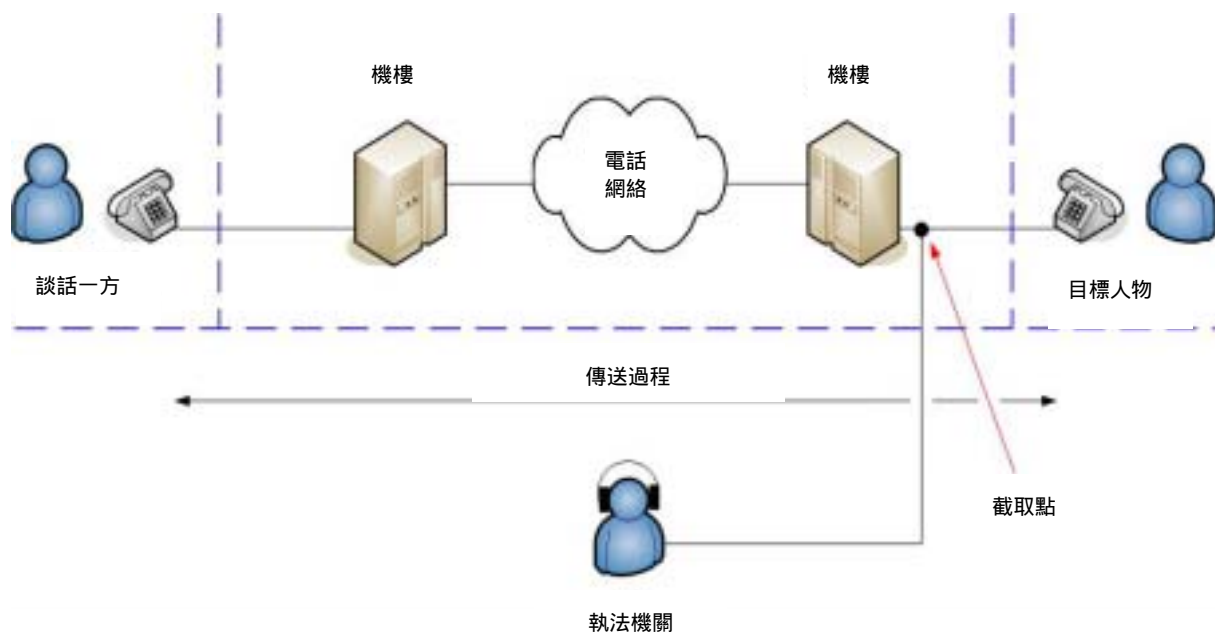
*“(a) 指用作以下用途的任何器材或程式：監測或記錄**藉電子方法**向任何資訊系統輸入資料或自任何資訊系統輸出資料；但*

(b) 不包括視光監察器材；”

第 2(1)條：“截取”的定義

- **請解釋截取通訊涉及的過程。(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五日有關器材的技術簡報會中提出)**

10. 基本上，電訊是透過網絡及網絡上的交換器傳送。理論上，我們可在傳送電訊路線上的任何機樓進行截取。這是藉着在通訊的訊號到達機樓時所觸動的設施接收訊號而達致的。以下為示意圖—



在執行上，使用哪個機樓視乎行動上的考慮等因素。

- **請解釋秘密監察電子郵件訊息和截取電子郵件訊息的分別。(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提出)**

11. 截取電訊指在電訊系統傳送訊息過程中取得訊息。訊息到達目的地後，便不再在傳送過程之中。視乎情況，當局可藉搜查令公開取得或藉數據監察器材秘密地取得電子郵件的訊息。裝設數據監察器材屬於第 1 類監察，與進行截取通訊一樣必須取得法官授權，而且必須符合相稱性和必要性的驗證準則。

第 2(1)條：“監聽器材”的定義

- **請考慮改善“監聽器材”定義的中文本的草擬方式。(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12. 我們明白法案委員會的關注，並將會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條正案，按下文所述修改中文文本中“監聽器材”定義的第(a)段－

“(a) 指用以作出以下行為的任何器材：竊聽、監聽、監測或記錄任何談話或在談話中向任何人或由任何人所說的說話；但”

第 2(1)條：“維修”的定義

- **請考慮刪除、規限或以其他詞語取代“維修”定義中“遷移”一詞。(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13. 提述“遷移”(“relocate”)一詞指在涵蓋將那些因為各種原因而有需要在安裝器材之後將有關器材移至另一位置的情況(例如視光器材在原有位置的視野被物件遮擋)。因應委員的關注，我們建議把“維修”(“maintain”)一詞的定義，修改如下－

““維修”(“maintain”)就某器材而言，包括－

- (a) 調校、修理或保養該器材，或**轉移其位置**；
及
- (b) 在該器材發生故障時，替換該器材；”。

第 2(1)條：“郵件截取”的定義

- **請解釋郵件截取是否包括以下行動：為了就郵遞品的內容進行科學鑑證的目的而開啟郵遞品、取得寄件人的姓名及地址，或在不閱讀有關內容的情況下更改該郵遞品的內容。(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14. 根據條例草案，“郵件截取”指某項藉郵政服務傳送的通訊在傳送過程中被並非該通訊的傳送人或傳送對象的人查察該通訊的某些或所有內容。根據第2(1)條，“藉郵政服務傳送的通訊”包括郵遞品。

15. 因此，就條例草案而言，截取郵政通訊的涵義廣闊，包括查察郵包內的通訊和其他物品。因此，秘密地

套取指模或查核傳送人的身分或地址，均屬郵件截取的定義所涵蓋的範圍。

16. 另一方面，郵件截取本身不應包括更換有關通訊的內容。

- **請考慮就“郵政服務”訂定更清晰的定義。（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17. 根據條例草案第2(1)條，“郵政服務”一詞被界定為指《郵政署條例》(第98章)所指的郵政服務。我們相信，通過提述《郵政署條例》，“郵政服務”一詞的涵蓋範圍應不會有疑問。舉例來說，這項服務必然不包括《郵政署條例》並無作出規定的快遞服務。不過，為回應委員的關注，我們建議進一步修訂有關定義如下：

““郵政服務”指《郵政署條例》(第98章)適用的郵政服務；”

第 2(1)條：“處所”的定義

- **請解釋對監察的授權會否涵蓋在香港境外使用監察器材，以及在香港境內對香港境外的目標人物使用監察器材。（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提出）**

18. 正如我們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解釋，執法機關的管轄範圍只涵蓋香港。條例草案並無擴大執法機關的管轄範圍。

19. 如器材被帶離香港，視乎情況，執法機關或可在香港接收該器材發出的訊號。執法機關可合法地接收該等器材發出的訊號，一如可以在香港截取在香港境外使用利用漫遊服務的流動電話撥出／接到的通話。

第 2(1)條：“公眾地方”

- **請考慮使用類似“用作或擬供用作”或“作...用途”的表達方式修訂“公眾地方”的定義中“屬擬供...用作...的範圍內”一語。(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提出)**

20. 條例草案訂明，“公眾地方” —

“(a) 指屬《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第 2(1)條所界定的公眾地方的任何處所；但

(b) 在上述處所**屬擬供**公眾人士**用作**洗手間、沐浴地方或更衣地方**的範圍內**，不包括該處所；”

21. 在(b)段中“屬擬供...用作...的範圍內”一語旨在訂明只有屬擬供用作特定用途的處所的部分，才會不包括在內。用作有關用途但原本並非擬供作該用途的地方不會計算在內。儘管如此，鑑於委員的建議，我們不反對剔除“的範圍內”一語，使有關“公眾地方”的定義的(b)段變為一

“(b) 不包括屬擬供公眾人士用作洗手間、沐浴地方或更衣地方的任何該等處所； ”

第 2(1)條：“嚴重罪行”

- **請提供一覽表，列明最高刑罰為監禁超過 3 年但少於 7 年的罪行。(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提出)**

22. 提出這問題時所考慮的情況，是執法機關可否在尋求授權的申請內，列明較為嚴重但與針對較低級別的罪行的行動有關的“相關”罪行。儘管在可處監禁三年至少於七年的罪行中，部分能對應最高刑罰為可處監禁七年或以上的“相關”罪行，但這類罪行的數目不多，而且要符合該等較嚴重罪行的定義須具備額外的元素(例如

意圖)¹。在其他個案裏，則沒有其他較高級別的罪行²。我們並不認為在申請中列出一項並非在調查之中的罪行是恰當的做法，因此，有關建議並非一項可行的安排。

第 2(1)條：“傳送”的定義

- **請考慮是否有需要為“傳送”一詞作出定義。(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提出)**

23. 我們同意嚴格來說，該定義並非必要。我們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刪除該定義。

第 2(1)條：“第 2 類監察”

- **請考慮把以浴室或更衣室為目標的視光監察或可帶入私人處所的追蹤器材豁除於第 2 類監察的涵蓋範圍。(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從“第 2 類監察”的定義中刪除“在任何秘密監察符合以下條文的範圍內”一語，並參照“(i)是—(A)參與該談話或該活動的人；或(B)預期可聽見該談話或看見該活動的人；或”的意思修訂同一定義的(a)(i)段；**
- **第 2(1)條中“第 2 類監察”的定義：簡化這定義(尤其是有關“在...的範圍內”、“器材”及“說出該說話”的提述)的草擬方式，並更清楚訂明屬於(a)段所訂“所進行的活動”一詞的涵蓋範圍的動作的種類。(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提出)**

24. 經考慮議員的提議，我們建議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下列方式簡化第 2 類監察的定義—

¹ 罪行例子包括：在無合法權限或辯解下偽造紙幣及輔幣(《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98(2)條)；持械偷竊(《盜竊罪條例》(第 210 章)第 27 條)；意圖損害等而施用毒藥等(《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212 章)第 23 條)。

² 例子包括：管有違禁武器(《武器條例》(第 217 章)第 4 條)；有關複製服務業務中管有侵權版本的罪行(《版權條例》(第 528 章)第 119A 條)；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161 條)。

“第 2 類監察” (Type 2 surveillance) 在第(3)及(3A)款的規限下，指 —

(a) 是由某人使用監聽器材或視光監察器材，為監聽、監測或記錄任何其他人所說的說話或所進行的活動的目的而進行的任何秘密監察，而使用該器材的人 —

(i) 屬在該其他人的意向或應有的合理預期中是會聽見該說話或看見該活動的人；或

(ii) 是在第(i)節所描述的人明示或默示同意下監聽、監測或記錄該說話或活動的人；或

... ..”

25. 我們認為，即使涉及浴室或更衣室，經修訂的定義仍屬恰當。如使用視光監察器材涉及未經准許而進入處所或未經准許而干擾任何物體的內部，則有關監察屬於第 1 類監察，否則應仍屬於第 2 類監察。任何人在使用浴室或更衣室時，應會採取合理措施，例如關窗及關門。

26. 另一相關事宜是，基於部分委員對第 2(2)條的關注，為免生疑問，我們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訂明“活動”並不包括談話。修訂後的條文如下—

“(2) 就本條例而言，在公眾地方進行任何活動的人，不得就該活動而視為屬第(1)款中“秘密監察”的定義(a)(i)段所指的有權對享有私隱有合理期望；但為免生疑問，本款並不影響該人就他在公眾地方所說的說話而享有的該項權利。”

第 2(1)條：“第 1 類監察”及“第 2 類監察”

- **請告知如採用不止一種器材／行動，是否需要較嚴格的授權。(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提出)**

27. 某項行動所需的授權級別，須視乎情況而定。如某項行動涉及使用多於一種器材，而有關情況須取得第 1 類授權，便須尋求法官授權。為免生疑問，我們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在第 2 條增訂一項新條文，內容如下—

“(3A) 部門的人員可在猶如任何第 2 類監察是第 1 類監察的情況下，申請就該第 2 類監察發出訂明授權或將訂明授權續期；而本條例中關於該申請及該訂明授權的條文適用於該第 2 類監察，猶如該第 2 類監察是第 1 類監察一樣。”

第 2(3)條

- **請考慮修訂第 2(3)條的用詞：參照“而相當可能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即視為第 1 類監察”。(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提出)**

28. 經重新審視在條例草案普遍採用的條文後，我們認為現時的草擬方式較為可取，令條例草案的內文更為一致。

第 2(4)條

- **請考慮第 2(4)(b)段是否有需要。(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提出)**

29. 這項條文有其必要，以明確訂明藉電訊系統傳送的通訊一旦到達目的地，便不再是在傳送過程中。否則，可能會出現爭拗，例如：電子郵件的傳送對象需否打開郵件才算作完成傳送過程。這可與郵包的情況比擬：有關包裹到達傳送對象的“郵箱”，傳送過程便視為完成。

第 2(5)條

- **請解釋“聯同該通訊一併產生的數據”的範圍，包括範圍是否包涵將會依附於通訊的數據。(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的會議提出)**

30. 聯同通訊一併產生的數據，包括一般所指的通訊資料數據。例子包括來電號碼 / 發出傳真的傳真機號碼、電子郵件的來源 / 目標地址，或封包交換網絡中見於每個封包開首的數據，該等數據顯示哪項通訊數據屬哪個通訊。條例草案第 2(5)條的定義的作用是確保收集這些資料，即使沒有取閱該項通訊的訊息本身，仍然會被視為截取，因而需要得到法官授權。

31. 通訊的附件屬通訊訊息的一部分，因此不是聯同通訊產生的數據。

第 2(5A)條

- **請考慮第 2(5A)條所述的“相當可能”的準則是否恰當。(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三日的會議提出)**

32. 建議的條例草案第 2(5A)條規定：

“就本條例而言，除非倡議、抗議或表達異見(不論是為達到某政治或社會目的或並非為該等目的)相當可能是藉暴力手段進行的，否則該等作為本身不得視為對公共安全的威脅。”

33. 我們已就應用這項條文的情況（即就倡議、抗議或表達異見在什麼情況下或可視為對公共安全的威脅，訂明摒除條文），仔細考慮“相當可能”這項準則。我們認為，這是恰當的驗證準則。某項倡議、抗議等進行之前，並不能事先確定其是否將會藉暴力手段進行。因此，只可以就這種可能性進行評估。

第 2(6)條

- **請考慮修訂第 2(6)條，提述有意包括在內的提出口頭申請的所有方式(包括“親身”提出的方式)所涵蓋的方法，提供參照。(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的會議提出)**

34. 考慮到委員的建議，我們將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該項條文如下：

“ (a) 如某申請是藉**親身口述方式**或藉電話、視像會議或可藉以聽見話音的其他電子方式提出的(不論該申請是否有部分是以書面提出的)，則該申請視為是以口頭方式提出的； ”

類似的修訂適用於同一條的第(b)及(c)段。

第 3 條

- **請考慮把“合理懷疑”的驗證納入第 3 條訂明的授權條件。(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相稱性的驗證準則是否過於局限，以及該驗證準則是否讓授權當局充分考慮人權方面的影響。(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的會議提出)**
- **在考慮第 3 條的草擬方式時，請考慮在“相稱的”之前加入“必需及”，以明確說明必要性的驗證準則。(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三日的會議提出)**
- **請就第 3 條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改善該條的流暢程度，及與條例草案其他部分配合。(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三日的會議提出)**

35. 基於委員就第 3 條提出的各項建議，我們已審慎研究該項條文，並會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在(1)(a)後加入下文—

“(aa) 有合理懷疑，懷疑有任何人曾涉及、正涉及或相當可能涉及 —

(i) (如謀求藉進行有關截取或秘密監察達到的目的是第(1)(a)(i)段所指明者)須予防止或偵測的嚴重罪行；或

(ii) (如謀求藉進行有關截取或秘密監察達到的目的是第(1)(a)(ii)段所指明者)構成或會構成對公共安全的有關特定威脅的任何活動；及”

修訂(1)(b)如下一

“(b) 在採取以下步驟之下，該截取或秘密監察對謀求藉進行該截取或秘密監察達到的目的是**必要的**，並且是與該目的相稱的一

(i) 在有關因素與該截取或秘密監察對將會屬其目標人物或可能受該截取或秘密監察影響的人的侵擾程度之間，求取平衡；

(ii) 考慮謀求藉進行該截取或秘密監察達到的目的，是否能合理地藉侵擾程度較低的其他手段達到；及

(iii) **考慮在有關情況下屬有關的其他事宜。**”

- **請在與有關政策局商討後，告知跟進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報告書就未經授權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訂立普遍適用的刑事罪行所提建議的時間表。(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的會議提出)**

36. 我們已諮詢民政事務局的意見。該局表示，在適當時候審慎及詳細評估法改會所提建議的影響，期間會考慮外國的經驗並諮詢有關人士，然後制定未來的路向。

現時，就這方面並無既定的時間表。

第 4 條

- **請提供第 4(2)(c)條所指的准許／規定進行的截取行動的其他成文法則的資料。(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的會議提出)**

37. 正如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的會議席上所解釋，有關的成文法則包括：

- 《破產條例》(第 6 章)－第 28 條
- 《郵政署條例》(第 98 章)－第 12 條
- 《進出口條例》(第 60 章)－第 35(3)條
- 《精神健康規例》(第 136A 章，附屬法例 A)
- 《監獄規則》(第 234 章，附屬法例 A)－第 47A、47B 及 47C 條
-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附表 2 第 8 條

38. 這些其他成文法則適用於它們所屬的特定範疇。讓這些行動因應其特定情況而按本身的制度受規限，是較合適的做法。我們現時的任務涉及為執法目的而進行截取通訊。這種做法亦與法改會在一九九六年發表的關於截取通訊的報告書的建議一致。

第 4 及第 5 條

- **請考慮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第 4(1)條，以達到以下的作用－“公職人員不得直接或間接(包括透過任何其他人)進行任何截取。”(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的會議提出)**

39. 我們不反對這項修訂建議。我們會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後的條文內容如下：

“4(1) ……公職人員不得直接或間接(不論是透過任何其他人或是以其他方式)進行任何截取。”

我們會建議對第 5(1)條作出類似的更改。

第 7 及第 11(3)條

- **請考慮提高行政授權的批准當局的級別至總警司。(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的會議提出)**
- **請提供執法機關中首長級薪級第一點人員的數目，並考慮提高批准申請法官授權的人員的級別。(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 **請就警隊內各個刑事單位主管的職級提供資料，並考慮禁止由同一單位的人員擔任行政授權的授權當局。(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明文訂明，批准申請法官授權的人員並不會直接參與有關調查。(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40. 在警務處、香港海關及入境事務處中屬公務員薪級表首長級薪級第一點(或同等職級)的人員數目，分別為 48、3 及 2 名。至於廉政公署，其架構中最低級的首長級職級等同首長級薪級第二點(即助理處長)，這個職級的人員共有 4 名。

41. 考慮到個別部門的情況。我們並不反對在執行上，把警務處、海關及入境處中授權人員的職級提高至等同首長級薪級第一點（即總警司或同等職級）或以上。至於廉政公署的有關職級則應維持於首席調查主任或以上。我們會在實務守則述明這項安排。

42. 掌管刑事組的人員通常為總警司。從宏觀層面來看，部門中“參與”某項調查的人員可能很多，如案情尤為嚴重，部門的人員參與的程度亦可能會增加。例如，

執法機關的首長可說是牽涉入所有的調查。作為一般原則，我們的用意是批准人員不應直接參與案件的調查工作。我們會在實務守則中說明這點。

第 8 條

- **請考慮明確訂明根據第 8(2)條提出的申請須以書面作出。(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的會議提出)**

43. 這項規定已在第 8(2)(a)條反映。

- **請考慮明文訂明，批准申請法官授權的人員與根據第 54 條進行檢討的人員不應為同一人。(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44. 負責批准申請的人員所扮演的角色，是考慮為取得法官授權而提出的申請是否恰當。另一方面，根據第 54 條進行檢討的人員，則是負責定期檢討執法機關人員遵守條例草案下的有關規定的情況。兩者的角色並無衝突，而我們認為無需在法律上明文規定擔當兩個角色的人員不得同為一人。不過，在執行上，兩者不會同為一人。我們會在實務守則說明這點。

第 10 條

- **請提供英國樞密院關於“期間”一詞的意思的判詞，以及考慮是否需要修訂第 10(b)條以清楚說明在某項指明事件發生時某項授權即會停止有效。(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的會議提出)**

45. 有關判詞載於附件 A。

46. 在參考判例法後，我們認為無需修訂第 10(b)條，以提述指明事件。

第 11 條

- **請考慮以“每份誓章的文本……”的方式修訂第 11(2)(b)(ii)條，以清楚說明應提供過往的所有誓章。
(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的會議提出)**

47. 條例草案第 11(2)(b)(ii)條的條文為“根據本部提供的**任何**誓章的文本……”。草案提述的“任何誓章”一語已包括過往為了（與現有的續期申請有關的）申請/續期而提供的所有誓章。不過，為顧及委員的關注，我們不反對將第 11(2)(b)(ii)條的“任何誓章”修訂為“所有誓章”及將第 17(2)(b)(ii)條的“任何陳述”修訂為“所有陳述”。

第 12 條

- **請考慮就過往進行的秘密行動的平均及最長時間提供資料。
(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的會議提出)**

48. 當個案結束後的一段期間，有關的紀錄便會銷毀。當中，關於電訊截取的紀錄會在短時間內銷毀。因此，所要求的資料已不存在。無論如何，對於日後的需要而言，過往在這方面的經驗並非是良好指引。

- **請考慮在第 12 條指明過往續期的次數應是考慮續期申請的一項因素。
(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的會議提出)**

49. 附表 3 第 4 部已規定須提供過往每次將有關授權續期的資料。授權當局毫無疑問會在考慮續期申請時顧及這項因素。我們認為，毋須為這目的而修訂第 12 條。

- **請考慮訂明由兩位而非一位小組法官考慮謀求將司法授權續期的申請。
(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的會議提出)**

50. 授權當局應可基於所提供的資料及理據作出決定。我們認為，規定由兩位法官考慮續期申請並不適當。

第 14 至 16 條

- **請告知現時可以申請進行秘密行動的人員的職級。(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規定由負責案件的人員提出申請。(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 **請解釋授權是向申請人發出還是向負責案件的人員發出、他們之間的工作關係、以及誰會提出續期申請。(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的會議提出)**

51. 可提出申請的人員的職級視乎案情而改變。執法機關現時的做法是由不低於督察或同等職級的人員提出。我們會在新機制下繼續這做法。

52. 謀求授權或續期的申請由負責個案的人員或由相同或較高職級的人員提出。這些人員均為對案件的背景資料有足夠了解的高級人員。

53. 授權/續期所涵蓋的是擬進行的行動，向誰發出不會影響其效力。在正常情況下，授權/續期會交回申請人。不過，授權的條款所涵蓋的行為，可以由申請人以外的人進行(例如第 29(5)及第 30(g)條所指的行為)，因此，或需要向這些人士出示授權的文本(如適當的話)。

- **請考慮在條例草案訂明，申請人員與授權人員不得同為一人。(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的會議提出)**

54. 申請人員與授權人員當然不會為同一人。我們認為，毋須在條例草案註明這一點。

- **請解釋如小組法官認為以往曾獲批准的第 2 類授權本應為第 1 類授權，他可做什麼。(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的會議提出)**

55. 對於什麼構成第 1 類及第 2 類監察，已有十分明確及客觀的準則。因此，出錯的可能性很低。儘管如此，授權當局如發現任何不符規定之處，他可在就申請作出決定時表達他的意見，而有關部門的首長定會得知有關意見。根據第 52 條，部門首長有責任向專員報告任何不遵守規定的情況。

- **請在實務守則闡釋第 1 類及第 2 類監察的分別(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的會議提出)**

56. 我們會在法定制度的基礎上，在實務守則就第 1 類及第 2 類監察的分別提供更多指引。

- **請考慮就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九日期間所提供的第 2 類監察的數字，提供當中涉及參與者監察的個案數目。(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五日及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57. 根據條例草案，某項行動如涉及參與者監察（第 2 類監察定義的(a)款），或（如使用視光監察器材或追蹤器材的話）不涉及未經准許而進入任何處所或干擾任何運輸工具或物體的內部(定義的(b)款)，即屬第 2 類監察。涉及參與者監察的行動涵蓋很多不同情況。例如，這些行動可以涉及臥底人員、受害人或線人。為保護這些秘密行動的運作方式的機密性，我們認為不適宜就不同類別的行動提供太詳盡的分項數字。事實上，我們未見有其他可供比較的海外司法管轄區有提供這類資料。

第 23 條

- **請考慮以例如“where the officer has failed to make an application for confirmation within the period of 48 hours ...”的方式草擬英文文本的第 23(3)條，以說明該條是一項罰則而不是選項。(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五日及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58. 我們認為，現行的草擬方式已可達致議員建議的效果，但鑑於某位議員的關注，我們不反對修訂英文文本的第 23(3)條文。經修訂的條文如下一

“(3) In default of any application being made for confirmation of the emergency authorization within the period....”

同樣道理，我們亦會就關於口頭申請的第 26(3)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達到相同效果。經修訂的條文如下^註：

“(3) In default of any application being made for confirmation of the prescribed authorization or renewal within the period....”

- **請考慮藉訂明不應直接或間接使用已銷毀的資料，以防止有關資料被用於其他範疇(例如在有關人員的誓章中被引述為資料來源)。(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59. 我們認為這樣的條文無法執行。我們雖可確保記錄在案的資料會被銷毀，但執法機關不可能控制已在其人員記憶中的資料會如何被使用。有關人員在(例如)宣誓時，也未必可能肯定說明某項所用資料的來源。

^註 現有的中文文本（即“如沒有……限期內提出尋求確認緊急授權的申請……”）已反映上述意思，毋須作出修訂。

- **請考慮在條例草案規定，即使沒有在緊急授權發出後 48 小時內向小組法官匯報，仍應向法官作出報告。(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60. 小組法官在確認程序中的角色是考慮謀求確認緊急授權的申請。如某部門沒有在 48 小時內申請確認，確認緊急授權的問題便不再存在。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執法機關為何沒有遵守有關規定。這大多視乎該個案的事實，而有關問題較適宜由專員考慮。此外，條例草案有其他條文，提供各種途徑讓專員採取他認為合適的跟進行動。在這情況下，我們認為，由部門首長向專員(而不是小組法官)報告會較為合適。

- **請考慮規定緊急授權如沒有根據第 23(3)(a) 條獲得確認，藉該緊急授權取得的全部資料，應只為供專員進行調查而被保存，而非予以銷毀。(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61. 正如第 56 條所反映，建議的制度的政策是，當根據條例草案採取行動所取得的成果，不再對訂明授權的有關目的屬必要時，該等成果便會銷毀。基於這個原則，關於銷毀依據緊急授權(及口頭授權)取得的資料的安排，是確保依據訂明授權取得的資料在授權未得到確認的情況下銷毀。我們認為，考慮到這類行動的對象的私隱，不宜為了供專員進行調查而保存資料。無論如何，正如第 23(3)(b) 條已訂明，部門首長向專員提交的報告中須載有有關個案的細節，以便專員檢討。

第 23 及 26 條

- **請考慮在條例草案規定，專員必須對緊急授權發出後或口頭申請提出後 48 小時內沒有尋求確認的個案展開調查。(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62. 我們預期，專員接到關於沒有根據第 23(3)(b)及 26(3)(b) (ii)條向部門首長尋求確認的報告後，自然會檢討該報告，以調查有關個案。我們不反對在條例草案明確訂明這點。為此，我們會提出修正案，把第 40 條擴展如下：

“(1A) 在不局限第(1)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凡有報告根據第 23(3)(b)、26(3)(b)(ii)或 52 條就任何個案向專員提交，專員須就該等個案進行檢討。”

第 23、24、26 及 27 條

- **請考慮第 23(3)(a)及第 26(3)(a)條有關“屬如沒有進行該截取或監察便不能取得的範圍內”的提述，是否必要。(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 **就第 24(3)(b)(ii)條而言，請考慮訂明有關資料應予銷毀，而非讓小組法官可以酌情決定。(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對第 26(3)/27(3)條作出類似對第 23/24 條所建議的修訂。(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63. 我們同意刪除第 23(3)(a)及第 26(3)(b)(i)條“屬如沒有進行該截取或監察便不能取得的範圍內”的建議。經修訂的條文如下－

第 23(3)條

“(a) 安排將藉進行有關截取或第 1 類監察取得的資料即時銷毀；及”

第 26(3)(b)條

“(i) 安排將藉進行有關截取或秘密監察取得的資料即時銷毀；及”

64. 我們並建議以下文的方式，對第 24(3)(b)及第 27(3)(b)條作出類似修訂－

“(b) (在任何情況下而不論在作出決定時該緊急授權是否仍然有效)命令有關部門的首長安排將以下資料即時銷毀－

(i) (在第(ii)節的規限下)藉進行有關截取或第 1 類監察取得的資料；或

(ii) (如(a)(ii)段適用)藉進行有關截取或第 1 類監察取得的屬該命令所指明的資料。”

第 24 條

- **請訂明一旦緊急授權不獲確認，該緊急授權應視為無效，而有關人員的豁免權只應涵蓋他在刑事法律方面的責任。(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65. 依據授權真誠地執行的行動不宜在事後變為不合法。因此，假使事後沒有確認緊急授權，也不宜把該授權視為無效。為有關人員根據緊急授權而進行的作為提供第 61 條所訂明的民事和刑事法律責任的豁免權，實屬合理。

第 25 至 28 條

- **請在實務守則規定，須就為行政授權的申請提交予授權人員的額外資料作出書面記錄。(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66. 這是我們預期的做法。我們會在實務守則清楚列明這項規定。

- **請考慮在實務守則規定，授權當局處理口頭申請時的筆記須存放於個案檔案內。(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 **請(在諮詢司法機構後)考慮可否由小組法官或申請人安排錄下口頭申請法官授權的過程。(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 **請訂明口頭申請行政授權的過程應該錄音。(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67. 按照我們目前的構思，向小組法官作出的口頭申請會在可行範圍內盡可能錄音。假如錄音並不切實可行，小組法官會作出書面紀錄。在行政授權方面，審批當局會就申請作書面紀錄。無論如何，申請人須在 48 小時內呈交書面申請，並附上支持申請的誓章 / 誓詞和文件，列明向授權當局作出口頭申請時陳述的事實，以申請確認。

第 29 條

- **請在實務守則列明在指明目標人物授權中增加電話號碼等程序，例如為何認為秘密行動的當事人“相當可能使用”該等號碼。(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68. 我們會在實務守則訂明有關程序。

- **請考慮收緊第 29(6)(c)條的措詞。(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會議提出)**

69. 考慮到委員的意見，我們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該條如下一

“(c) 授權截取因截取根據該訂明授權而授權截取的通訊，而**必然產生的連帶**截取的任何通訊；及”

- **請考慮明文訂明，第 29(7)條的(a)(ii)、(b)(ii)及(c)(ii)款授權使用武力進入的做法，不能經行政授權獲得批准。(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會議提出)**

70. 我們同意該建議。我們會指明，授權進入的條文只適用於第 1 類監察。以下為將會就該三項條款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a) (凡第(2)(a)款適用)－

.....

(ii) (就第 1 類監察而言)授權進入(在有需要時可使用合理武力進入).....；

(b) (凡第(2)(b)款適用)－

.....

(ii) (就第 1 類監察而言)授權進入(在有需要時可使用合理武力進入).....；及

(c) (凡第(2)(c)款適用)－

.....

(ii) (就第 1 類監察而言)授權進入(在有需要時可使用合理武力進入).....。”

- **請考慮清楚述明第 29(6)(d)條所述的“任何人”是指除執法機關人員以外的人。(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會議提出)**

71. 第 29(6)(d)條授權**為執行一項訂明授權**而提供用以識別授權所指明的特定目標人物的通訊的地址、號碼等詳情。條文的用意是向協助有關行動的人提供地址或號碼，以識別擬截取的通訊。這項條文的授權範圍已受到非常嚴謹的限制，我們認為無須按建議作出修訂。

- **請解釋如有人不提供根據第 29 條規定須提供的協助，他會有什麼後果，以及這會否相當於干犯阻撓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的罪行。(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72. 正如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及二十日的會議所確認，任何人不會因未有按第 29 條的規定向執法機關提供協助而招致刑事法律責任。其中，拒絕提供協助並不會構成違反各項有關阻撓或不協助公職人員執行其職務的法例條文。

第 29 及 30 條

- **請考慮應否在第 29 及 30 條使用“亦”(also)/“進一步”(further)的字眼。(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73. 我們不反對將第 30 條對“進一步”(further)的提述更改為“亦”(also)，並會提出相應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請考慮訂明在提述“在有需時使用武力”之處，訂明只會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74. “在有需時使用武力”這用詞已有既定涵義，意指不多於所需要的力度。基於行動的秘密性質，任何所使用的力度將會是所需的最少力度。不過，我們理解委員的關注，而並不反對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使第 29 及 30 條各項有關“在有需時可使用武力”的提述改為“在有需時可使用合理武力”。

- **請考慮對在執法行動期間所引致的財產損害作出補償的現行機制，是否足以對在秘密行動期間受損害的財產作出補償，以及是否需要訂立特別的補償機制。(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在條例草案或實務守則規定，執法機關在秘密行動後通常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盡快取出器材。(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75. 條例草案所涵蓋的行動的秘密性質，已限制了財產受干擾的程度。任何對財產作出的干擾必須獲得小組法官根據第 29(4)條作出的明確授權。我們預期，在絕大部分的個案中，所作出的干擾不會造成任何損害。即使有任何損害，亦會極為輕微。按照政策，我們會修妥造成的任何損害，並會在實務守則訂明這一點。

76. 事實上，我們的政策是在使用監察器材後，在合理可行範圍內盡快嘗試取出器材。我們會在實務守則訂明這一點。

77. 鑑於秘密行動的性質，在條例草案訂明補償機制未必切實可行。對受干擾財產的擁有人作出補償會暴露有關行動，並可能危害該行動。同樣，在若干情況下，在行動後取出監察器材未必切實可行。取回器材可能暴露秘密行動或危及執法機關人員的安全。目標人物亦可能已經發現有關器材，而在這情況下，並無需要取出器材。

78. 儘管如此，鑑於議員的關注，我們建議，規定在進行根據條例草案獲授權的行動期間若有財產受任何損害，執法機關必須向專員報告所有有關財產受干擾的個案。他們並且須向專員報告為修妥損害而採取的補救行動及（如損害不能被修妥的話）有關原因。專員可就此檢討執法機關在這方面採取的措施是否足夠。如他認為恰當，可根據第 48 條向行政長官作出報告，或根據第 50 條向執法機關提出建議。

79. 同一制度適用於在訂明授權有效期屆滿後取出器材的情況。執法機關應向專員報告所有沒有就尚未取出的器材申請器材取出手令的個案及有關原因。同樣，專員可就此檢討執法機關提供的資料及提出的理由。而如他認為恰當，可根據第 48 條向行政長官作出報告或根據

第 50 條向執法機關提出建議。

第 30 及 36 條

- **請考慮清楚訂明第 30 條只涵蓋附帶行為。(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會議提出)**

80. 我們同意有關建議。擬議修訂如下－

“第 30 條

訂明授權亦同時授權從事為進行根據該授權而授權進行或規定進行的事情的目的而需要的及所連帶的行為，包括以下行為……”

同樣，我們會提出修訂第 36 條如下－

“第 36 條

器材取出手令亦同時授權從事為進行根據該手令而授權進行的事情的目的而需要的及所連帶的行為，包括以下行為……”。

第 30A 條

- **請考慮修訂第 30A 條的“通常由某律師……使用”為“執法機關知悉或合理地相信／預期是通常由律師……使用的”。(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81. 雖然我們認為現時建議的第 30A(1)(a)(ii)條（在較早前文件保安局檔號：ICSB 11/06 所建議）提述“通常由某律師……使用”的草擬方式已足夠明確，但我們不反對修訂為“申請人知悉或申請人按理可被預期知悉是通常由某律師……使用的”。

- **請考慮擴大第 30A 條所述對律師的建議保障至包括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法律助理。(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82. 法律助理若與律師在同一處所(包括律師的辦公室以及律師使用以提供法律意見的處所)工作，他們已受有關建議機制保障。我們認為，該保障已屬足夠。

- **請考慮修訂第 30A 條對“其他有關處所”的定義的草擬，以並非詳盡無遺的方式加入一些例子，例如監獄及法庭的會見室。(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83. 根據建議的第 30A(1)條，“其他有關處所”的定義為“就某律師而言，指通常由該律師及其他律師為向當事人提供法律意見而使用的任何處所(該律師的辦公室除外)”。基於律師確實會在監獄及法庭的會見室向他們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意見，這些處所已包括在該定義內。我們認為，把這些處所在法定定義中列出作為示例，並不適當。不過，我們會把這些處所列於根據條例草案發出的實務守則作為示例。

第 38 條

- **請提供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清楚訂明專員的續任，是由行政長官按首席法官推薦而作出的。(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84. 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如下一

“第 38 條

(5A) 以往曾獲委任為專員的人，可按照本條例中適用於委任專員的條文，不時再獲委任為專員。”

- **請重新考慮，把合資格的擔任專員一職的人選限於退休法官會否較恰當，以及專員以非全職方式工作是否適當。(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提出)**

85. 為了令人選範圍較大，我們認為，把現任和退休法官都包括為條例草案中可被委任為專員的合資格法官，是恰當的做法。事實上，任命現任法官擔任法定職位的例子不少³，我們認為這安排並無不妥之處。我們從司法機構方面了解，在香港居住的退休法官人選非常有限，而且他們未必願意擔任有關工作。我們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交的人手建議，在司法機構開設包括兩個原訟法庭法官職位、以應付實施新機制產生的新增職務對司法機構的影響。當中解釋，基於專員的工作性質及預計工作量，我們估計有關法官須用相當的時間處理有關職務。我們已就獲委任為專員的現任法官在任期內不聆訊任何案件的建議，諮詢司法機構。司法機構並不反對這建議。

- **請考慮在條例草案中訂明，行政長官就專員的委任須經立法會批准。(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86. 根據條例草案，行政長官會按首席法官的建議委任專員。由於專員為高等法院法官級別或以上的前任或現任法官，我們認為條例草案所建議的安排已屬恰當。這與很多其他法定職位的委任安排一致，例如申訴專員及私隱專員等。

- **請考慮設立委員會以覆檢專員的工作。(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³ 例子包括以下組織的主席：根據第 571 章設立的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根據第 524 章設立的長期監察刑罰覆核委員會；根據第 325 章設立的監管下釋囚委員會；根據第 571 章設立的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根據第 541 章設立的選舉事務委員會；以及根據第 584 章結算及交收上訴審裁處。

87. 正如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六日在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解釋(請參閱保安局檔號：ICSB 1/06附件A8)，委任單一位人士為法定當局，不論在本港或海外都是慣常做法。例如：香港的申訴專員和私隱專員均為法定監督；在英國，根據《2000年調查權力規管法令》，截取通訊專員為監察監督；在澳洲，則由申訴專員履行有關在調查罪行方面的截取通訊的監察職責。

88. 專員會獲足夠支援，以便履行其在條例草案所訂的職能。他亦會根據條例草案就擁有廣泛索取資料的權力。專員的周年報告會提交立法會省覽。我們認為，另外成立委員會監督專員的工作的作用不大。其他法定監督(例如申訴專員及私隱專員)亦沒有這類安排。

- **請考慮規定小組法官是以個人名義獲委任。(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會議提出)**

89. 只有合資格法官才可獲委任為專員，如規定他們完全以個人身分接受委任則可能有誤導。因此，我們認為不宜採納這項修訂建議。

第 39 條

- **請考慮擴大專員的職權範圍，監督政府整體的遵守情況，包括本條例草案並無涵蓋的部門的人員。(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會議提出)**
- **請以書面確認，行政長官指令執法機關首長的權力不會凌駕條例草案的條文。(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明確規定第 39(a)條亦應涵蓋行政長官。(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會議提出)**

90. 一如向委員所解釋，只有附表 1 內指明的執法機關人員才可以根據條例草案進行截取通訊或秘密監察。在進行這類行動時，他們必須遵守條例草案訂明的相關規

定。其他部門的人員不得進行這類行動，如他們這樣做，有關行為便是不合法作出的。條例草案有關授權申請、對成果的保障、備存紀錄等的詳細條文，對他們並不適用。由於條例草案就指定執法機關的人員和其他部門的人員的適用有所差異，所需的監督自然有所不同。

91. 我們認為，沒有在附表 1 內指明的部門應負責確保他們的人員依法執行職務。任何違反的情況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及香港人權法案處理。因此，我們仍然認為，專員的職權範圍已屬恰當。

92. 一如我們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會議確認，行政長官指令執法機關首長的權力不會凌駕條例草案的條文，包括向部門施加銷毀秘密行動的成果的責任的條文。

93. 我們已於保安局檔號：ICSB 14/06 號文件就條例草案適用於行政長官的事宜作出解釋。我們並不擬如建議般修訂第 39(a)條。

- **請重新考慮有關“審查”和“檢討”的提述是否恰當，以及由專員進行的檢討和審查應否採用同一用詞（檢審）。（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會議提出）**

94. 我們曾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上解釋條例草案中“審查”和“檢討”的含意。簡要來說，“審查”只可根據訂明的原則在所界定的情況下進行，而“檢討”的涵蓋範圍則較“審查”廣泛，而且更為全面。我們認為，兩套程序採用不同用詞較為可取，因此現時的用語是恰當的。

- **請考慮明文規定第 39(b)條(尤其是第(iv)項)所載專員的具體職能屬於第 39(a)條所指的一般職能的範圍。（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會議提出）**

95. 根據條例草案現時的草擬方式，第 39(b)條(包括第 39(b)(iv)條)所列的專員職能，已必須為第 39(a)條所涵蓋的範圍。在這方面的修訂並無需要。

- **關於第 39(b)(iv) 條，請考慮把有關“進一步職能”的提述改為“進一步職責”。（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會議提出）**

96. 正如在會議上解釋，和在多項其他法例一樣，“職能”的定義包括“職責”，所以該提述在條文內是適當的。

第 40 及 41 條

- **請考慮專員檢討的範圍應否包括小組法官。（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明文規定專員可向小組法官報告其定論。（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97. 正如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上解釋，根據條例草案所述制度，專員的角色是監督執法機關。不過，我們同意，在部分情況下，專員在執行職責期間的定論、斷定及建議對小組法官可能有若干參考價值。我們因此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訂明專員如認為合適，除可向行政長官及律政司司長報告外，也可根據第 41(3)、46(3)及 50(3)條向小組法官報告。經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的條文如下—

“第 41 條

(3) …… 專員可……將有關定論及他認為合適的任何其他事宜提交予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或任何小組法官**，或提交予他們之中的任何人或所有人。”

第 46 及 50 條會作出類似修改。

第 41 條

- **請考慮明確規定部門根據第 41 條採取的措施應包括任何紀律處分。（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98. 我們同意這項建議。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如下—

“ (2) 如部門的首長根據第(1)款接獲專員的定論的通知，他須在接獲該通知後，於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向專員提交一份報告，其內須載有該部門已為回應該等定論所指出的任何問題而採取的任何措施**(包括就任何人員採取的紀律行動)**的細節，如專員在發出該通知時已指明提交該報告的限期，則該報告須在該限期內提交。 ”

第 46(2)及 50(2)條的類似條文，將會作出相若修訂。

第 42 條

- **請考慮把申請準則由“相信”改為“懷疑”。（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99. 我們同意這項建議，並會按此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第 43 條

- **關於第 43(1)(a)條，請考慮把須予審查的行動的範圍擴大至所指稱的行動以外，以涵蓋未有接到投訴但被揭露的行動。（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 **請告知哪些人士屬於通知／補償機制所適用的行動的當事人。（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應否授權專員在給予執法機關申述機會後，可下令銷毀從合法行動所得資料。（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100. 我們在文件(保安局檔號：ICSB 14/06)建議採納一項通知機制。根據該機制，如專員發現“錯誤”行動，他會作出通知。

101. 在大多數情況下，行動的當事人是授權所指名或以其他方式識別的人。在其他情況，行動的當事人可能不是授權所指名的人或在授權中未能容易識別的人。在這些情況下，專員會確定最直接受影響的人（如有的話）。然而，根據第 42 條提出的審查申請，專員只要能夠確立申請人曾是沒有妥為授權的行動的對象，則不論申請人是否有關的“當事人”，專員亦可能斷定申請人得直。

102. 根據第 46 條，專員的審查結果若斷定申請人得直，他須把其斷定通知有關部門的首長。部門首長在接獲該通知後，須向專員提交一份報告，其內須載有該部門已為回應因該斷定而產生的任何問題而採取的任何措施的細節。我們預期，該等措施須包括處理從截取或秘密監察所得的任何成果的情況。專員如認為適當，可向部門首長提出建議，或把事件提交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或小組法官。

第 45 條

- **請考慮明確訂明可基於第 51 條取得的資料，根據第 45(1)(b)條進行審查。(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103. 專員可**為執行他在條例草案下的任何職能**而援引第51條。由於進行審查是專員的職能之一，他當然也可就審查援引第51條。因此，我們認為所建議的修訂並無必要。

- **請考慮設立特別代訟人制度。(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104. 根據建議的制度，專員是獨立的監察當局，有廣泛

權力調查執法機關遵守有關規定的情況。在執行他在條例草案下的職能（包括在審查申請）時，他定會考慮有關行動的當事人的權利。條例草案已提供非常有力的保障，沒有相若的司法管轄區在授權、實施以及實施後的檢討和申訴等階段，提供相同程度的保障及制衡機制。因此，我們認為毋須再藉特別代訟人制度，加入另外一層的機制。

第 47 條

- **請把下列各項列入專員周年報告的資料清單—**
 - (a) 按監察類別的分項數字（第 1 類/第 2 類）；**
 - (b) 罪行／公共安全個案及／或公共安全個案的主要類別；**
 - (c) 續期的期限；**
 - (d) 主動通知個案的數目；**
 - (e) 涉及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個案數目；及**
 - (f) 口頭申請和授權的數目。****（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在專員周年報告中提供就因執法機關人員不遵守規定而被紀律處分的個案，執法機關所採取的跟進行動。（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105. 考慮委員的建議後，我們同意應增加資料清單的內容，以包括下列新項目 — 按監察類別（第 1 類/第 2 類）的分項數字、作出通知個案的數目，以及口頭申請和授權的數目。至於有關續期的數字，除了續期申請數目外，我們亦會提供續期超過五次的個案數目。我們並且同意提供向專員報告涉及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個案數目。基於先前在保安局檔號：ICSB 5/06 及 ICSB 12/06 號文件所解釋的理由，當局難以提供罪行及公共安全個案的分項數字。提供公共安全個案主要類別亦存在類似困難。

106. 根據第 47(d)條，專員的周年報告須提供的其中一項資料是專員根據第 40 條進行的檢討的撮要。我們已另外建議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訂明這類檢討包括就部門首長根據法律規定提交的各份報告所進行的檢討。我們預期，執法機關就執法機關人員因不遵守規定而被紀律處分所採取的任何行動的資料，均會列入這些報告。儘管如此，鑑於委員的建議，我們不反對就此作出明文規定。

107. 反映上文所述各項建議的更改，而就第47條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如下—

“第 47(2)(a)條

(a) 一份清單，顯示—

(i) 在該報告期間，根據本條例發出的**法官授權、行政授權及緊急授權**的各別數目，及該等授權**各別**的平均時限；

(第(ii)、(iii)及(iv)條會作出相若修訂)

(iia) 在該報告期間，因應根據本條例提出的口頭申請而發出的法官授權、行政授權及緊急授權的各別數目，及該等授權各別的平均時限；

(iib) 在該報告期間因應根據本條例提出的口頭申請而續期的法官授權及行政授權的各別數目，及該等授權各別的平均續期時限；

(iic) 在該報告期間，根據本條例續期而在續期之前已獲 5 次或多於 5 次續期的法官授權及行政授權的各別數目；

.....

- (iva) 在該報告期間，為尋求發出法官授權、行政授權及緊急授權而根據本條例提出的並遭拒絕的口頭申請的各別數目；及
- (ivb) 在該報告期間，為尋求將法官授權及行政授權續期而根據本條例提出的並遭拒絕的口頭申請的各別數目；”

“第 47(2)(d)條

(d) 一份清單，顯示－

.....

- (iva) 專員在該報告期間曾根據第 46A 條發出通知的個案的數目；

.....

- (va) 由於依據訂明授權進行任何截取或秘密監察而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個案的數目；及
- (vb) 曾按照根據第 41、46 或 50 條提交予專員的任何報告而就任何部門人員採取的任何紀律行動的性質概要；及

.....”

- **請考慮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預算案的有關程序中提供有關秘密行動開支的資料。（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108. 在審議周年開支預算期間，曾有建議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各類資料，以量化我們的截取電訊行動，而我們曾表示，我們會考慮在我們建議的法例下提供這類資料。根據現時的條例草案，專員會在周年報告提供多項這類的資料，該報告會交予立法會省覽。我們會研究如何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預算反映這類資料。

- **請告知其他可作比較的司法管轄區的報告與專員的周年報告所包括的相若資料類別。(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109. 不同司法管轄區要求的做法並不相同。在英國，《2000年調查權力規管法令》沒有列出在專員報告內須包括的資料，而只規定專員必須就履行其職能向首相提交周年報告。

110. 在美國，《聯邦竊聽法令》規定，美國法院的行政辦事處應就尋求授權或批准截取的申請數目，及年內批予或拒絕發出的命令及續期的數目，以及數據的撮要和分析，向國會提交周年報告。

111. 在澳洲，由部長根據《1979年電訊(截取)法令》擬備周年報告，列出手令申請、電話申請、續期申請、嚴重罪行的類別，手令的期限的資料、手令效用的資料等數字。

112. 在加拿大，就《刑事法典》的刑事案件來說，加拿大副檢察長須列出申請授權及續期獲批准或拒絕的數目、獲批的授權或續期的平均期限、通知的數目、所給予授權針對的罪行的統計數字、被逮捕人數、以截取所得的通訊作為證據的訴訟程序數目、定罪數目、曾使用從截取得到的資料的調查數目，以及在罪行的調查、偵測、預防及檢控工作中截取通訊的重要性的整體評估等。

113. 我們認為，建議列入專員周年報告的資料列表與上述其他司法管轄區相比，就算並非更全面，最少也屬不遑多讓。

- **請考慮設立機制，就根據條例草案第47(5)條，須提交予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專員周年報告的文本中剔除的事宜，向立法會告知專員及行政長官是否有意見分歧之處。(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114. 我們不反對規定如行政長官行使其權力，從提交予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專員周年報告的文本中剔除某些事宜，可對有關事實作出提述。為此，我們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第 47(4)條如下—

“行政長官須安排將報告的文本連同述明以下事宜的陳述，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是否有任何事宜在沒有專員的同意下根據第(5)款從該文本中剔除。”

第 49 條

- **根據條例草案第 49(2)條，凡專員向保安局局長提出任何有關修改實務守則的建議，局長是否有責任實施該等建議，還是只有在局長實施該等建議時才須通知專員？(助理法律顧問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信件中提出)**

115. 正如條例草案第 59(1)條規定，發出實務守則的權力屬於保安局局長。雖然條例草案沒有明文規定保安局局長有責任考慮專員就守則所作的建議，但保安局局長無疑會這樣做。我們亦預期，假如保安局局長不採納專員的建議，他會向專員解釋原因。專員如不滿意，可向行政長官報告及/或把有關事宜載於其周年報告。

第 51 條

- **請考慮明文規定專員有權管理其支援人員。(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提出)**

116. 在條例草案下，專員的職能中已隱含專員可管理任何人員，以協助他執行職能的意思。儘管如此，我們會在委任專員時清楚說明這點。

第 52 條

- **請考慮訂明，執法機關不僅須向專員報告不遵守有關規定的情況，也須報告失誤。**

117. 一項例如提供錯誤資料的錯誤，已構成不遵守規定。不過，鑑於委員的建議，我們不反對清楚訂明這點，在第 47(2)(d)條提述“不符合規定或有錯誤”。我們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如下第 47(2)(d)條(ii)項如下一

“(ii) 在該報告期間進行的檢討中發現的任何不符合規定**或有錯誤的**個案的數目及性質概要；”

第 55A 條

- **請考慮在第 55 條附近增訂條文，以達到“如有重大改變，包括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可能性的改變或目標人物的緘默權受侵犯，任何授權即停止有效”的效力。(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118. 基於議員的建議，我們建議在第 55 條後增訂一項條文，規定就一項拘捕行動會對若繼續進行截取或秘密監察而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可能性的影響，作出評估。該評估須在有關的拘捕行動後盡快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呈交有關授權當局。授權當局如信納繼續行動的條件不再獲符合，須撤回授權。所需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如下一

“55A. 繼續逮捕某人後向有關當局提供報告

(1) 凡在根據本條例發出訂明授權或將訂明授權續期之後，有關部門在當其時負責有關截取或秘密監察的人員知悉該截取或秘密監察的目標人物已被逮捕，該人員須在他得悉該項逮捕後，於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安排向發出該訂明授權或將該訂明授權續期的有關當局，提供一份報告，評估該項逮捕對會藉繼續進行該截取或秘密監察而取得任何可能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可能性的影響。

(2) 凡有關當局接獲第(1)款所指的報告，如該當局認為第 3 條所指的訂明授權持續有效的先決條件未獲符合，則該當局須撤銷該訂明授權。

(3) 凡訂明授權根據第(2)款被撤銷，則儘管有有關時限條文的規定，該授權自被撤銷之時起失效。

(4) 如在根據第(1)款向有關當局提供報告時，該當局不再擔任其職位，或不再執行其職位的有關職能，則 —

(a) 在不損害《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54 條的原則下，在該款中對有關當局的提述，包括提述在當其時獲委任為小組法官或授權人員(視屬何情況而定)並合法地執行該當局的職位的有關職能的人；及

(b) 本條的條文據此適用。

(5) 在本條中，“有關時限條文”(relevant duration provision)指第 10(b)、13(b)、16(b)、19(b)或 22(1)(b)條(視屬何情況而定)。”

119. 另外，因應以往刪除第 2(7)條的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我們會對第 26 及 55 條提出與上文第 55A(4)款相若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第 59 條

- **第 2 條把“有關規定”界定為包括在實務守則下任何適用的規定，而執法機關遵守有關規定的情況會受到專員的檢討及審查。請就此事宜澄清實務守則的地位。(助理法律顧問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信中提出)**
- **請說明政府會否就違反條例草案條文、違反實務守則，以及違反訂明授權或器材取出手令所訂條件作出任何區分。(助理法律顧問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的信中提出)

120. 正如以往向委員解釋(見保安局檔號: ICSB 3/06), 如執法人員違反新法例, 以及實務守則或有關授權訂明的條件, 便可遭受紀律處分, 或視乎情況, 可能觸犯普通法中擔任公職時行為不當的罪行, 以及繼續受各項現行法律約束。違反上述規定的嚴重程度及因此而須採取的紀律處分行動(或刑事行動), 須視乎有關個案的實際情況, 並須考慮違反規定的嚴重程度, 而不是所違反的規定的類別(即條例草案、守則或授權)。

- **請解釋政府當局將如何公布及向公眾發表實務守則? 條例草案第 59 條並無就此訂定任何明確條文。條例草案第 59(3)條訂明保安局局長可按照與他發出實務守則的權力相符的方式, 修改整套實務守則或其任何部分, 但條例草案第 59(1)條並無指明有關的方式。(助理法律顧問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信件提出)**

121. 正如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六日提交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的文件所指出, 政府將會公布該守則。因此, 守則會受到公眾審視。按照政府的一般做法, 有關守則可藉印刷或電子方式(或以該兩種方式)公布。

122. 關於**與他根據本條發出實務守則的權力相符的方式**的提述, 是指保安局局長只應為向執法人員提供實務指引而發出實務守則。換言之, 他不可為不相關的目的而在條例草案下發出守則。

- **請考慮在條例草案恢復進行二讀前, 提供實務守則的最新草擬本。(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123. 實務守則的草擬工作須顧及對條例草案作出的修訂, 因此只可在所有修訂事項確定後才能敲定。無論如何, 我們會致力在條例草案恢復進行二讀之前, 向委員提供實務守則的最新擬稿。

第 62 條

- **請考慮規定，根據條例草案第 62 條、就加入新類別監察器材訂立的規例，須經過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的會議提出)**

124. 附屬法例的制訂，會受到立法會審議。不過，基於部分委員的關注，我們同意根據第 62 條制訂的規例，須經過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就第 62 條所需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如下—

在該條加入“在立法會批准下，”，使其讀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立法會批准下，為以下目的訂立規例 — ...”

我們會對第 63 條作出相若修訂如下—

在該條加入“在立法會批准下，”，使其讀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立法會批准下，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修訂附表1、2、3及4。”

附表 2

- **請考慮明文訂明，如小組法官已拒絕某項申請，執法機關不會基於完全相同的資料再提出該申請。(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的會議提出)**

125. 正如先前解釋，我們預期執法機關不會在申請被拒後，提出完全相同的授權申請。不過，在先前的申請被拒後，執法機構可能基於完全合理的理由(例如情況可能有變或有新的資料)，而再提出新的申請。由於執法機關提出申請時，須提供有關他們先前申請的資料，小組法官將加以考慮。此外，我們會在根據條例草案發出的實務守則清楚訂明，除非出現新情況或有進一步的資料，否則當某項申請被拒後，便不應再次提出。

- **請提供其他法例提述“非公開的情況下”一詞(附表 2 第 1(1)條)的例子。(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的會議提出)**

126. “非公開的情況下”這個用語普遍用於香港法例，等同“閉門”。舉例來說，該用語見於《高等法院規則》(第 4 章附屬法例 A)第 46 號命令第 5 條、第 52 號命令第 6 條、《勞資審裁處條例》(第 25 章)第 18 條及《領養規則》(第 290 章附屬法例 A)第 4 條。此外，司法機構發出的報告也有使用該用語，例如黎守律法官的《不公開審理的民事程序工作小組報告書》(香港司法機構，1997 年)。我們相信這點已清楚明確。

- **請考慮對附表 2 第 3(6)條採用更直接的草擬方式。(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的會議提出)**

127. 在檢討這項條文後，我們認為現時的草擬形式與條例草案的內容較為一致，因此較為可取。

- **請考慮附表 2 第 3(5)條應否涵蓋執法機關以外的其他各方，以便可向他們提供有關文件的文本。(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的會議提出)**

128. 根據條例草案的建議制度，小組法官所保存的文件，只是為了與其作為授權當局的職能有關的目的。已密封的封套並不應為其他不相關的目的而打開。條例草案訂明的安排，已容許有關執法機關保存因授權而產生的文件，其他各方在有需要時可向執法機關索取有關文件。我們認為毋須修訂附表第 3(5)條，以訂明須向執法機關和（在另行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中所述）專員以外的各方提供有關文件的文本。

- **請考慮把附表 2 第 1、2 及 4 條移往主體法例。(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的會議提出)**

129. 現時的草擬方式，旨在在附表中規定有關程序和附屬事宜。鑑於委員的建議，由於條例草案第 4 條處理小

組法官的地位及權力等較為廣泛的事宜，我們不反對把該條的內容移往條例草案的主體部分。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附表 2 第 1、2 及 3 條由於涉及行政程序，保留在附表 2 較為恰當。

130. 我們將會提出以下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便如上文所述修改條例草案第 6 條—

“(3A) 小組法官在執行他在本條例下的任何職能時 —

(a) 不得視為法院或法院的成員；但

(b) 具有與原訟法庭的法官就該法庭的法律程序而具有者相同的權力、保障及豁免權。”

- **請解釋附表 2 第 4 條所訂明小組法官的“權力、保障及豁免權”。(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的會議提出)**

131. 條例草案附表 2 第 4 條訂明，小組法官在執行他在本條例草案下的任何職能時，會具有與原訟法庭的法官就該法庭的法律程序而具有者相同的權力、保障及豁免權。原訟法庭的法官具有法定權力及普通法權力。他的法定權力由《高等法院條例》及《高等法院規則》訂明。

132. 原訟法庭的法官及其進行的法律程序的保障及特權，均為普通法得的保障及特權。原訟法庭的法官享有保障，不須為在執行其職能期間所做或所說的負上民事訴訟的責任。這項保障擴展至法庭以外的類似審裁處⁴。

133. 我們除將有關條文移往主體法例外，亦刪除了“以司法身分行事”的提述。正如我們向委員解釋，這提述旨在澄清小組法官在執行他在條例草案下的職能時，並不視為法院。鑑於部分委員的關注，我們同意這提述並非絕對必要。

⁴ Halsbury's Laws Vol 1(1) 第 197-202 段

- **請考慮在條例草案明確訂明專員有權要求小組法官開啟密封的封套，供專員檢查。(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訂明除小組法官外，專員也可開啟及密封根據附表 2 第 3 條密封的封套。(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的會議提出)**

134. 條例草案第 57 條訂明，執法機關須備存指明事宜的妥善紀錄，包括關乎發出訂明授權或器材取出手令或將訂明授權續期的申請的事宜，以及條例草案所訂定的其他事宜。這項安排的目的，包括讓專員取得所需資料，以便妥善檢討執法機關遵守條例草案以及實務守則和訂明授權的規定的情況。由於執法機關所備存有關法官授權的文件及紀錄的文本會由小組法官根據附表 2 第 3(2)(a) 條核證，因此執法機關備存的文件的真確性應毋須置疑。更重要的是，執法機關須備存**其他**文件及紀錄，以便專員履行其職責。因此，專員取用小組法官備存的密封封套的需要應極少。在罕有的情況下，專員如認為須取用小組法官備存的文件，可向小組法官提出。鑑於委員的關注，我們建議加入明確條文，訂明小組法官在專員要求下，須讓專員取用其備存的文件。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如下—

“第 51 條

(1A) 專員可為執行他在本條例下的任何職能，向小組法官要求讓他可取用根據附表 2 第 3 條保存的任何文件或紀錄。”

135. 附表 2 第 3(3)(b)條須相應地加入下文—

“(包括關乎他遵從專員根據第 51(1A)條作出的要求的職能)”

- **請解釋小組法官在按其命令密封的封套上蓋上其印章之舉的重要性，以及每位小組法官是否均有其本身的印章。(助理法律顧問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

信件中提出)

136. 在條例草案建議的兩項有關小組法官的規定，即小組法官須安排以在每一份文件或紀錄的文本上蓋上他的印章並於其上簽署的方式，核證該文本(附表 2 第 3(2)(a)條)，並安排把該等文件保存於按他的命令密封的封套內(附表 2 第 3(1)及第 3(4)(b)條)，是為提供額外的安全保障措施。

附表 3

- **請告知附表 3 第 1 及 2 部是否已反映第 3 條規定的各項授權條件。(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規定申請人員必須在誓章上證實其所陳述的事實，是盡其所知的真確事實。(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規定申請人在誓章上提供有關過往向小組法官提出／被小組法官拒絕的申請的資料(如知道的話)。(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在誓章述明批准申請的首長級人員是誰。(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在誓章述明合理懷疑的理據。(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規定須在誓章內作出取得新聞材料的可能性的評估。(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法改會就規定須列入誓章的資料種類所提的建議。(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a)把第 1 部(b)(ii)及(iii)的“如知道的話”改為“盡其所知／據其所得的全部資料”；(b)把第(vii)項的“其他人”改為“該人或其他人”；(c)在第 1 部(c)，加入有關人員的職位(除姓名和職級外)。(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 **請解釋是否有責任在向小組法官提交的申請中作出全面披露。(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修訂附表 3 第 4 部(a)(iii)，以確保全面披露，例如以“評估”取代“價值”。(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的會議提出)**
- **請考慮修訂附表 3 第 1 部(b)(iii)，使其與第 29(1)(b)(ii)條的用詞相乎(即“正使用或相當可能會使用”)。(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會議提出)**

137. 我們已檢討附表 3 第 1、2 及 3 部，並認為當中已反映第 3 條擬規定的各項授權條件。

138. 我們同意，申請人有責任披露與小組法官達致決定時應顧及的因素相關的事項。我們的意圖，是執法機關應在申請中列出所有過往的相關申請。我們同意在附表 3 明確列出這項規定。我們提議，這項規定與條例草案所述執法機關須保留授權紀錄的最短時限(兩年)作相關的處理。對於委員建議修訂附表 3 第 4 部(a)(iii)(關於申請續期)，以“評估”取代“價值”，我們並無異議。

139. 至於新聞材料，我們相信對侵擾程度的評估必定顧及所有因素。儘管如此，我們並不反對明文規定須評估取得新聞材料的可能性。

140. 第 3 條在按照另行的建議予以修訂後，將明確提述合理懷疑。因此，毋須在條例草案附表 3 作另文規定。同樣，我們相信現時“如知道的話”及“其他人”的草擬方式，已十分清楚明確，因此並不建議作修訂。

141. 我們已研究法改會在二零零六年三月發表的報告書《私隱權：規管秘密監察》所建議納入秘密監察申請的資料。有關項目大致與附表 3 所述相若。

142. 參照法案委員會的討論，我們會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附表 3 的有關部分，以訂明必須提供下列的額外資料：

- (a) 過往提出申請的資料；
- (b) 提出申請的人員的職位；
- (c) 取得新聞材料的可能性的評估；
- (d) 批准提出授權申請以進行截取或第 1 類監察的首長級人員的身分。

143. 反映上文第 141(a)段的建議而對附表 3 第 1 部作出的改變，將會參照下文所述：

“(x) (如知道的話)是否有在過去 2 年期間，提出將第(ii)節所提述的人識別為有關截取或秘密監察的目標人物的，尋求發出訂明授權或將訂明授權續期的申請；而如有上述申請的話，該申請的細節；”

144. 反映上文第 141(b)及(d)段的建議而對附表 3 第 1 部作出的改變，將會參照下文所述：

“(c) 以姓名、職級及職位識別申請人及批准提出該申請的該有關部門的任何人員。”

145. 反映上文第 141(c)段的建議而對附表 3 第 1 部作出的改變，將會參照下文所述：

“(viii) 會藉進行該截取而取得任何可能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或任何可能屬新聞材料的資料的可能性；”

附表 3 及 4 的相關條文會予以相類修訂。

146. 申請人員在擬備誓章／陳述以支持其提出授權申請時，必然是在證實當中所提事實是盡其所知的真確事實。

147. 我們會參照下文修訂附表 3 第 4 部(a)(iii)：

“(iii) 對至提出該申請為止已依據該法官授權或行政授權取得的資料的價值的評估；”

- **以過往案例說明，根據條例草案附表3就截取通訊或監察提出法官授權申請時向小組法官提供的資料，屬於何種類別的資料。(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會議提出)**
- **請以模擬方式，詳細解釋在誓章提供的資料類別。(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的會議提出)**
- **請提供條例草案所述的申請的樣本。(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的會議提出)**

148. 根據條例案提出申請的兩項示例現載於**附件 B**。

保安局

二零零六年六月

[1988] 1 W.L.R. 919

Page 1

1988 WL 624537 (Privy Council), [1988] 1 W.L.R. 919, [1989] 1 HKLR 233, (1988) 85(31) L.S.G. 35, (1988) 132 S.J. 1118, [1988] HKLY 13, [1988] HKLY 532, [1989] HKLY 27, [1989] HKLY 597

(Cite as: [1988] 1 W.L.R. 919)

*919 Elvira Vergara and Another v. Attorney-General of Hong Kong

Privy Council
PC (HK)

Lord Bridge of Harwich, Lord Brandon of Oakbrook, Lord Brightman, Lord
Griffiths and Lord Ackner
1988 May 24, 25; June 27

[Appeal from the Court of Appeal of Hong Kong]

Hong Kong--Immigration--Foreign domestic helpers--"Limit of stay"--Permission to land or remain in Hong Kong until specified date or two weeks after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contract whichever earlier--Validity of condition limiting stay--Immigration Ordinance (Laws of Hong Kong, 1987 ed., c. 115), ss. 2(1), 11(2)(a)--Immigration Regulations (Laws of Hong Kong, 1980 rev., c. 115, s. 59), reg. 2(2), (5)

[FN1] [FN2]

FN1 Immigration Ordinance, s. 2(1): see post, p. 926E. S. 11(2)(a): see post, p. 922B.

FN2 Immigration Regulations, reg. 2(2) and (5): see post, p. 927E-F. Vergara v. A.-G. of Hong Kong (P.C.)

Foreign nationals were permitted to stay in Hong Kong for a limited period to work as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for a particular employer under an approved contract of employment. Permission was required for a change of employer. The two applicants were Philippine nationals working as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each having originally been granted permission to remain for a specific six-month period after which extensions of stay for further specified periods were granted. In March 1987 modification of immigration policy applicable to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was announced whereby those landing or applying for an extension of stay would be subject to a new condition limiting their stay to a particular period or two weeks after termination of their contracts, whichever was the shorter time. Thereafter when each applicant applied for an extension of stay an officer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cting pursuant to section 11(2)(a) of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stamped an endorsement on her passport stating that permission to remain was extended until a stated date or two weeks after termination of her contract, whichever was earlier. The applicants applied by notice of motion to the High Court of Hong Kong for judicial review seeking, inter alia, a declaration that the permission granted in so far as it included the condition limiting the stay to two weeks after termination of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if earlier than the specified date was ultra vires the powers given to the officer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under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The judge dismissed the motion and the Court of Appeal upheld that decision.

On the applicants' appeal to the Judicial Committee:--

Held, dismissing the appeal, (1) that "limit of stay" in section 2(1) of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was not restricted to a stay of a specific duration but, even if the subsection was ambiguous, the contemporaneous Immigration Regulations made it plain that section 11(2)(a) of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empowered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r immigration assistant, where permission was given to a person to land or remain in Hong Kong, to impose a condition of stay limiting the period by reference not only to a specified date but also to a contingent *920 event or to the earlier of two events which were both bound to occur (post, pp. 926F-G, H, 927D-E).

1988 WL 624537 (Privy Council), [1988] 1 W.L.R. 919, [1989] 1 HKLR 233, (1988) 85(31) L.S.G. 35, (1988) 132 S.J. 1118, [1988] HKLY 13, [1988] HKLY 532, [1989] HKLY 27, [1989] HKLY 597

(Cite as: [1988] 1 W.L.R. 919)

Hanlon v. The Law Society [1981] A.C. 124, H.L.(E.) applied.

(2) That, although imposition of the condition limiting the stay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to two weeks after termination of their contracts if earlier than the stated period otherwise permitted increased their vulnerability and on rare occasions the actual date on which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terminated might be uncertain, the condition of stay was not so unreasonable as to be an abuse of power and thus ultra vires; and that, therefore, the limit of stay imposed on giving the applicants permission to remain was valid (post, pp. 929A, E-F, H-930A).

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Ltd.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 1 K.B. 223, C.A. considered.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Appeal of Hong Kong affirmed.

The following cases are referred to in the judgment of their Lordships:

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Ltd.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 1 K.B. 223; [1947] 2 All E.R. 680, C.A.

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 A.C. 374; [1984] 3 W.L.R. 1174; [1984] 3 All E.R. 935, H.L.(E.)

Hanlon v. The Law Society [1981] A.C. 124; [1980] 2 W.L.R. 756; [1980] 2 All E.R. 199, H.L.(E.)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cases were cited in argument:

Gunton v. Richmond-upon-Thames London Borough Council [1981] Ch. 448; [1980] 3 W.L.R. 714; [1980] 3 All E.R. 577, C.A.

Hall & Co. Ltd. v. Shoreham-by-Sea Urban District Council [1964] 1 W.L.R. 240; [1964] 1 All E.R. 1, C.A.

Jackson v. Hall [1980] A.C. 854; [1980] 2 W.L.R. 118; [1980] 1 All E.R. 177, H.L.(E.)

London Transport Executive v. Clarke [1981] I.C.R. 355, C.A.

Mixnam's Properties Ltd. v. Chertsey Urban District Council [1964] 1 Q.B. 214; [1963] 3 W.L.R. 38; [1963] 2 All E.R. 787, C.A.; [1965] A.C. 735; [1964] 2 W.L.R. 1210; [1964] 2 All E.R. 627, H.L.(E.)

Neill v. Glacier Metal Co. Ltd. [1965] 1 Q.B. 16; [1964] 2 W.L.R. 55; [1963] 3 All E.R. 477

Rigby v. Ferodo Ltd. [1988] I.C.R. 29, H.L.(E.)

APPEAL (No. 50 of 1987) with leave of the Court of Appeal of Hong Kong by the applicants, Elvira Vergara and Gwenn Arcilla, from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Appeal of Hong Kong (Roberts C.J., Silke V.-P. and Addison J.) given on 14 October 1987> dismissing an appeal by the applicants from the judgment of Jones J. in the High Court of Hong Kong on 17 August 1987, whereby he dismissed the applicant's notice of motion applying for judicial review.

The facts are stated in the judgment of their Lordships.

1988 WL 624537 (Privy Council), [1988] 1 W.L.R. 919, [1989] 1 HKLR 233, (1988) 85(31) L.S.G. 35, (1988) 132 S.J. 1118, [1988] HKLY 13, [1988] HKLY 532, [1989] HKLY 27, [1989] HKLY 597

(Cite as: [1988] 1 W.L.R. 919)

Representation

Anthony Scrivener Q.C. and Johnny Mok (of the Hong Kong Bar) for the applicants.

Michael Thomas Q.C. (of the English and Hong Kong Bars) and Bernard Whaley, Senior Crown Counsel, Hong Kong, for the Attorney-General.

Cur. adv. vult.

LORD ACKNER

27 June. The judgment of their Lordships was delivered by LORD ACKNER.

*921 The applicants are two Philippine nationals who came to work in Hong Kong as domestic workers.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F.D.H.") constitute a special category of full-time live-in contract workers who are only admitted into Hong Kong for a limited period at a time, in order to work for a nominated employer under an approved contract of employment. Since the early 1970s there has been a greatly increased demand for F.D.H., their numbers having risen from a few thousand to the current figure of 38,000. Most of them are Philippine nationals, who have left the Philippines because of unemployment or low wages. Many of them are in great need of reasonable salaries, so that they can support their family or relatives at home through regular remittances.

Each of the applicants had separately been given permission to reside in Hong Kong following approved procedures which their Lordships will describe later. On 24 March 1987, when the applicants were lawfully in Hong Kong, modific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policy was announced, which applied to all F.D.H. who thereafter sought permission to land or remain in Hong Kong. It was implemented with effect from 21 April 1987.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 review

On 10 July 1987, the first and second applicants, together with two other F.D.H., obtained leave from Jones J. to apply to the High Court for judicial revie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ubstantive hearing on 30 July 1987, leave was obtained to amend the relief sought which, in so far as it concerned the applicants, was:

"1. A declaration that the first applicant was under no legal obligation to leave Hong Kong after 14 days from the termination of her employment with Mrs. Mirpuri and that she can lawfully remain in Hong Kong thereafter until 16 September 1987 ...

"5. A declaration that the permission granted by an officer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to the [second applicant] to remain in Hong Kong until 26 December 1987, in so far as it includes the condition 'or two weeks after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whichever is earlier,' is ultra vires the powers given to the said officer under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c. 115.

"6. A declaration that the [second applicant] was under no legal obligation to leave Hong Kong after 14 days from the termination of her employment with Madam Ng Man. Chi and that she can lawfully remain in Hong Kong thereafter until 26 December 1987."

This motion was dismissed by the judge, and his decision was upheld on appeal by the Court of Appeal of Hong Kong (Roberts C.J., Silke V.-P. and Addison J.) in judgments delivered on 14 October 1987. Leave to appeal to Her Majesty in Council was given by the Court of Appeal of Hong

1988 WL 624537 (Privy Council), [1988] 1 W.L.R. 919, [1989] 1 HKLR 233, (1988) 85(31) L.S.G. 35, (1988) 132 S.J. 1118, [1988] HKLY 13, [1988] HKLY 532, [1989] HKLY 27, [1989] HKLY 597

(Cite as: [1988] 1 W.L.R. 919)

Kong on 19 November 1987.

The relevant statutory provisions

These are to be found in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c. 115) as amended and the Immigration Regulations which are made thereunder. It is common ground that by virtue of section 7(1) the applicants were not lawfully able to land in Hong Kong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r assistant.

Section 11 is the principal section dealing with the grant of permission to land and the following subsections are of relevance to this appeal: *922

"(1)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r immigration assistant may, on the examination under section 4(1)(a) of a person who by virtue of section 7(1) may not land in Hong Kong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r immigration assistant, give such person permission to land in Hong Kong but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nly may refuse him such permission.

(1A)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r immigration assistant may, on the examination under section 4(1)(b) of a person who by virtue of section 7(2) may not remain in Hong Kong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r immigration assistant, give such person permission to remain in Hong Kong but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nly may refuse him such permission.

(2) Where permission is given to a person to land or remain in Hong Kong,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r immigration assistant may impose --

(a) a limit of stay; and

(b) such other conditions of stay as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r immigration assistant thinks fit, being conditions of stay authorised by the Director, either generally or in a particular case.

(3) Subject to subsection (9), the permission given to a person to land or remain in Hong Kong shall be deemed to be subject to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of stay in addition to any conditions of stay imposed under subsection (2)

(5A) An immigration officer may at any time by notice in writing to any person other than a person who enjoys the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 or has the right to land in Hong Kong by virtue of section 8(1) --

(a) cancel any condition of stay in force in respect of such person;

(b) vary any condition of stay (other than a limit of stay) in force in respect of such person if the condition as varied could properly be imposed by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ther than the Director) under subsection (2)(b);

(c) vary any limit of stay in force in respect of such person by enlarging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such person may remain in Hong Kong.

(6) The Governor may at any time vary any limit of stay in force in respect of any person by curtailing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such person may remain in Hong Kong, and the Director shall in writing notify such person of any such variation.

(7) The Governor may by order applying to all persons or to any class or description of persons, other than persons who enjoy the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 or have the right to land in Hong Kong by virtue of section 8(1) --

(a) cancel or vary any condition of stay in force in respect of such persons;

(b) impose any condition of stay (other than a limit of stay) in respect of such

1988 WL 624537 (Privy Council), [1988] 1 W.L.R. 919, [1989] 1 HKLR 233, (1988) 85(31) L.S.G. 35, (1988) 132 S.J. 1118, [1988] HKLY 13, [1988] HKLY 532, [1989] HKLY 27, [1989] HKLY 597

(Cite as: [1988] 1 W.L.R. 919)

persons

(9)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may exempt any person or any class or description of persons from compliance with all or any of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of stay.

(10) Any permission given to a person to land or remain in Hong Kong shall, if in force on the day that person departs from Hong Kong, expire immediately after his departure."

Reference should also be made to two other sections of the Ordinance. Section 51 empowers the Governor to give directions to any public officer with respect to the exercise or performance by him of his functions, powers or duties under the Ordinance. It was under this section that the Governor acted when instructing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to give effect to the new policy decided upon in March 1987 by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Section 52 empowers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in his turn, to give directions to immigration officers and *923 immigration assistants with respect to the exercise or performance by them of any of their powers, functions or duties under the Ordinance.

The policy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t the time that the applicants were granted permission to enter

Before a F.D.H. can land in Hong Kong she must have entered into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with her prospective employer. The contract and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hich include a medical certificate and testimonials, are required to be submitted to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through the overseas British visa post in the country of the helper's domicile. If the documents are in order,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will authorise the overseas visa post to issue to the helper an employment visa which reads:

TABULAR OR GRAPHIC MATERIAL SET FORTH AT THIS POINT IS NOT DISPLAYABLE

Until 21 April 1987, F.D.H. were normally admitted for the purpose of performing the approved contract of employment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six months. Thereafter, extensions of stay were normally granted for further periods of six months provided that the contract of employment was still continuing. The endorsements on the passport would read:

TABULAR OR GRAPHIC MATERIAL SET FORTH AT THIS POINT IS NOT DISPLAYABLE

After a F.D.H. had ceased employment she was permitted to stay in Hong Kong until the end of the current six-month period of stay.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did not consider that, by virtue of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of employment, it was necessary to apply to the Governor for curtailment of stay under section 11(6) of the Ordinance. Unless there had been a breach of condition of stay, it was not the policy to seek a removal order under section 19. Applications to change an employer were normally approved where the contract was *924 terminated during the second year of employment provided that all other conditions of stay had been satisfied. However, they would not normally be approved where the termination occurred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employment, although approval had been given in exceptional cases.

The new policy

Although in theory the policy outlined above should have given rise to no problems, in practice it proved defective and was publicly criticised. Some F.D.H. were deliberately breaking their contracts early in the six-month period in order to work in other part-time or full-time jobs until the period of

1988 WL 624537 (Privy Council), [1988] 1 W.L.R. 919, [1989] 1 HKLR 233, (1988) 85(31) L.S.G. 35, (1988) 132 S.J. 1118, [1988] HKLY 13, [1988] HKLY 532, [1989] HKLY 27, [1989] HKLY 597

(Cite as: [1988] 1 W.L.R. 919)

stay had expired, or in order to find another employer. This gave rise to complaints by the employer who had made all the arrangements to bring the F.D.H. to Hong Kong and had paid the travel expenses. It also gave rise to complaints by local people who wished to secure employment as part-time domestic helpers and who found themselves in competition with F.D.H. who had only been admitted to work full-time. Moreover it resulted in some cases in the employment of F.D.H. in jobs for which, under general policy, foreign nationals were not admitted, for example, bars and clubs.

Accordingly, on 24 March 1987, the Acting Governor, on the advice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ordered that in future all F.D.H. landing in Hong Kong, or subsequently applying for extension of stay in Hong Kong, should ordinarily be subject to a new condition of stay to the effect that they would be allowed to remain in Hong Kong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ir current six-month limit of stay or *for two weeks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their contract, whichever is the shorter period*.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was however at liberty to make provision to suit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a particular case. Furthermore, a change of employer would not normally be allowed, either in the first or second year of the contract, save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Thereafter, whenever F.D.H. landed in Hong Kong in order to take up an approved contract of employment, a stamped endorsement was placed in their passport at the port of entry by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r assistant in these terms:

"EMPLOYMENT -- Permitted to remain until ...
or two weeks after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whichever is earlier. For
employment with Mr./Mrs.
D.H. Contract No
CHANGE OF EMPLOYER IS NOT PERMITTED."

Whenever F.D.H. applied for and were granted extensions of stay during the subsistence of an approved contract of employment, a stamped endorsement was placed in their passport by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r assistant at the offices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in these terms:

"EMPLOYMENT" -- Permission to remain extended until ...
... or two weeks after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whichever is earlier.
For employment with Mr./Mrs. ...
D.H. Contract No ...

CHANGE OF EMPLOYER IS NOT PERMITTED."

*925 In each case, the first blank was ordinarily filled by inserting a date six months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previous six-month period. The name of the employer and the contract number were also written in.

Immigration officers, in applying the new policy, did pay regard to the need to adapt it to meet exceptional or extenuating circumstances and F.D.H. have been granted extensions of stay beyond the two-week period following the termination of their employment. There have been cases where they have been permitted to change their employers without leaving Hong Kong, as indeed occurred in this case.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applicants

1. *The first applicant.* She had first landed in Hong Kong on 16 March 1986. Subsequently her stay in Hong Kong had been extended. At the date when leave was given to bring proceedings for ju-

1988 WL 624537 (Privy Council), [1988] 1 W.L.R. 919, [1989] 1 HKLR 233, (1988) 85(31) L.S.G. 35, (1988) 132 S.J. 1118, [1988] HKLY 13, [1988] HKLY 532, [1989] HKLY 27, [1989] HKLY 597

(Cite as: [1988] 1 W.L.R. 919)

dicial review (10 July 1987), she was in Hong Kong with permission to remain in Hong Kong until 16 September 1987 for the purpose of employment with Mrs. Bina Mirpuri. This permission to remain for six months was granted on 12 March 1987 under the former policy and expired the day before the Court of Appeal began to hear the appeal.

She stated on oath that for some months previously she had in fact been working for the mother of her ostensible employer, that as a result of injury she had been advised by a doctor not to work, that this led to disputes with her employers, that she had complained to the labour department, and that on 29 June 1987 she had been forced to leave the premises where she was employed. She maintained that the contract had not been validly terminated and that she was owed wages. 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was unaware of these matters until after proceedings had been instituted.

Since these proceedings were instituted she has been permitted to remain in Hong Kong, to change her approved employment and to remain until 15 August 1988 or two weeks after termination of her contract, whichever is earlier.

2. *The second applicant.* She had first landed in Hong Kong on 16 August 1985. Subsequently her stay in Hong Kong had been twice extended. Following notification of termination of her employment she had been permitted to remain as a visitor for two months. She then left Hong Kong with a re-entry visa for employment purposes, and returned on 26 April 1987 to resume employment with Madam Ng Man. Chi. On landing she was given permission to stay for only two months because her passport was then due to expire. After she had produced a new passport, her stay in Hong Kong was further extended on 3 June 1987. At the date when leave was given to bring proceedings for judicial review, she was in Hong Kong with permission to remain until 26 December 1987 or two weeks after termination of her contract of employment with Madam Ng Man Chi, whichever was the earlier. This was granted on 3 June 1987 under the modified policy.

She stated on oath that on 15 June she was forced to leave her place of employment by her employer who claimed that she (Miss Arcilla) had been absent from work without permission and that the contract was terminated. Later, on 21 July 1987,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se proceedings, she attended at the offices of 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seeking permission to change her employer. Subsequently she was permitted to remain in Hong Kong and to change her authorised *926 employment and thereafter to remain until 2 May 1988 or two weeks after termination of her contract, whichever was earlier.

Relief now claimed

It is common ground that the new policy, which after due publicity came into effect on 21 April 1987, has thereafter operated to the exclusion of the original policy. Having regard to this fact, and the change in the applicants' circumstances since these proceedings were launched, the first and sixth of the declarations sought from Jones J. are now wholly academic. Accordingly it was common ground that their Lordships should only be concer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fifth declaration, with the necessary alteration of the tense, having regard to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live issue which falls to be determined remains, namely whether the imposition of the condition now stamped ("the chop") on the passport on the grant or the extension of the permission "or two weeks after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whichever is earlier" is ultra vires the powers given to the officer under section 11(2) of the Ordinance.

The applicants based their contention that the condition is ultra vires on two grounds. These are

1988 WL 624537 (Privy Council), [1988] 1 W.L.R. 919, [1989] 1 HKLR 233, (1988) 85(31) L.S.G. 35, (1988) 132 S.J. 1118, [1988] HKLY 13, [1988] HKLY 532, [1989] HKLY 27, [1989] HKLY 597

(Cite as: [1988] 1 W.L.R. 919)

(1) that on the true construction of the Ordinance, the officer has no power to impose such a condition. This submission was reject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2) That the condition was Wednesbury unreasonable: 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Ltd.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 1 K.B. 223. This point was not taken either before Jones J. or the Court of Appeal.

1. Section 11(2) -- its true construction

Under this section, where permission is given to a person to land or remain in Hong Kong,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r immigration assistant may impose a "limit of stay." The words "limit of stay" are defined in section 2(1) of the Ordinance as meaning "a condition of stay limiting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a person may remain in Hong Kong." The applicants' contention is that this condition can only limit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a person may remain in Hong Kong by specifying a specific date. In their Lordships' view this is too narrow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finition. A permitted period may not only be limited by reference to a stated date, but by reference to a contingent event or by reference to the earlier in time of two events, each of which is certain to happen. Such conditions "limit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a person may remain" and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Ordinance which would suggest that such conditions are excluded from the definition. On the contrary having regard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legislation, namely the control of immigration, it is to be expected that the power to impose conditions limiting the stay would be flexible rather than rigid, as the applicants' interpretation would suggest.

However, if the correct view is that the definition is ambiguous, then their Lordships are entitled, in ascertaining its true meaning, to have regard to the Immigration Regulations which came into force on 1 April 1972, contemporaneously with the Ordinance.

In expressing their readiness to use these regulations, if necessary, as an aid to construction of the Ordinance their Lordships are pleased to follow the decision of the House of Lords in Hanlon v. The Law Society [1981] A.C. 124. In his speech, which was concurred in by all the other *927 members of the Appellate Committee, Lord Lowry said, at pp. 193-194:

"A study of the cases and of the leading textbooks ... appears to me to warrant the formulation of the following propositions: (1)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may be used in order to construe the parent Act, but only where power is given to amend the Act by regulations or where the meaning of the Act is ambiguous ... (3) Regulations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a certa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t tend to confirm that interpretation. (4) Where the Act provides a framework built on by contemporaneously prepared regulations, the latter may be a reliable guide to the meaning of the former."

The power to make regulations is given to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inter alia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for any matter or thing which is to be or may be prescribed under this Ordinance:" see section 59(a) of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It will be recalled that section 11(3) provides that, subject to any exemptions that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may grant, permission given to a person to land or remain in Hong Kong shall be deemed to be subject to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of stay, in addition to any conditions of stay imposed under section 11(2). Regulation 2 of the Immigration Regulations provides for these mandatory conditions of stay. Thus regulation 2(4) makes specific provision, where permission is given to a person to land in Hong Kong for employment. Such permission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of stay that he shall only take such employment or establish or join in such business as may be approved by the Director." Significantly regulations 2(2) and 2(5), in prescribing conditions of stay, limit the period of stay by reference respectively to a contingent event or two alternative periods.

1988 WL 624537 (Privy Council), [1988] 1 W.L.R. 919, [1989] 1 HKLR 233, (1988) 85(31) L.S.G. 35, (1988) 132 S.J. 1118, [1988] HKLY 13, [1988] HKLY 532, [1989] HKLY 27, [1989] HKLY 597

(Cite as: [1988] 1 W.L.R. 919)

Regulation 2(2) provides:

"Permission given to a person to land in Hong Kong in transit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of stay that he shall not remain in Hong Kong after the departure of the ship on which he arrived in Hong Kong."

Regulation 2(5) provides:

"Permission given to a person to land in Hong Kong as a contract seaman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of stay that he shall not remain in Hong Kong after the departure of a specified ship or later than 14 days after the date of landing, whichever is earlier."

It is not suggested on behalf of the applicants that these regulations are ultra vires and yet "condition of stay" is not used in the restricted sense for which they contend.

2. "*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

To succeed under this heading, the applicants must establish that the decision to impose the new condition was

"so outrageous in its defiance of logic or of accepted moral standards that no sensible person who had applied his mind to the question to be decided could have arrived at it:" *per* Lord Diplock in 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 A.C. 374, 410.

If the decision was so irrational or so perverse, it is surprising that this point was not taken either at first instance or in the Court of Appeal in *928 Hong Kong. The basis of the attack is not that the abuse by F.D.H. of their permission to land or remain in Hong Kong, as described earlier, did not take place or did not necessitate greater regulation or control of the F.D.H. The Attorney-General's evidence of the urgent need for more effective restrictions was not challenged. Mr. Scrivener, on behalf of the applicants, based his submission essentially on two separate contentions which can conveniently be considered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ings.

Additional vulnerability

Mr. Scrivener contended that the new "chop" imposed a wholly unreasonable increase in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F.D.H. In order to assess the strength of this submission it is important to contrast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se women under the new style approval with the old style approval. The gist of the judgments at first instance, and in the Court of Appeal, is that the first applicant had permission to remain in Hong Kong and that such permission was subject to an implied limit of stay, namely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her contract of employment subsisted. Jones J. also held that the implied condition governed the original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suggestion that such a limit existed was contrary to the submission of the Attorney-General made before Jones J. Although counsel for the Attorney-General in the Court of Appeal adopted the judgment of Jones J., Mr. Michael Thomas, appearing before their Lordships, did not seek to argue for such an implication. He submitted that the express words of the chop "Employment -- Permission to remain until (six-month period)" did not suggest any such implication -- quite the contrary. Moreover no such limit was mentioned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or the explanatory notes issued to the F.D.H. in the Philippines, and no such limit was ever enforced. In their Lordships' judgment, under the old style permission, if the F.D.H.'s employment ceased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of the stated limit of stay, the F.D.H. was entitled to remain in Hong Kong for the balance of the period. However by virtue of regulation 2(4) she was not entitled

1988 WL 624537 (Privy Council), [1988] 1 W.L.R. 919, [1989] 1 HKLR 233, (1988) 85(31) L.S.G. 35, (1988) 132 S.J. 1118, [1988] HKLY 13, [1988] HKLY 532, [1989] HKLY 27, [1989] HKLY 597

(Cite as: [1988] 1 W.L.R. 919)

to take any new employment unless and until it was approved by the Director. Since these women were encouraged to (see clause 5(d) of their contract of employment) and did remit part of their salary to their family or dependents in the Philippines, it was most unlikely, if their employment was termina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ir stay, that they would financially be in a position to remain unemployed for the balance of the permitted stay. Accordingly, particularly as the date of the expiration of the six-month period approached, these women were in a vulnerable situation vis-a-vis a ruthless employer. Moreover, if the contract terminated after the initial six-month period had expired and her limit of stay had been enlarged for a second or subsequent period of six months, although the F.D.H. would be permitted to find a new employer, she would have to obtain a "release letter" from her former employer, confirming that he/she did not object to her change of employment. Indeed in the applicants' written case it was conceded that even under the old policy the F.D.H. were vulnerable to abuses on the part of their employers:

"F.D.H.s in their isolation are always at risk of physical and even sexual abuses, and may be afraid to complain to the authorities because they cannot afford to lose their jobs or prejudice their prospect of future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929 It is certainly true that the F.D.H.'s vulnerability, vis-a-vis her employer, was increased by the change of policy, because although the termination of her employment did not ipso facto render her continued residence in Hong Kong illegal, it provided her with a very limited period in which either to return to the Philippines or to explain her problems to the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with a view to their approving her obtaining other employment. It has not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period of 14 days in which to leave the Philippines was too short, or that the women were unaware of their entitlement to seek help from the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or that there wa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r ability to assist by the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when they were thus contacted. Indeed the situation of these two applicants, as described above, establishes the sympathetic treatment which they in fact received. Their Lordships' attention was drawn by Mr. Scrivener to an undated letter written by the second applicant and received by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on 17 June 1987, two days after she alleged she had been summarily dismissed by her employer. In the final paragraph of this letter she maintains a claim for one month's salary in lieu of notice, cost of her passage home and the travelling allowance as stipulated in her contract and seeks the assistance of the Director. This letter was in fact exhibited to the affirmation of Peggy Dee, acting principal immigration officer. She stated that the second applicant's employer had not by then notified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and that, before an officer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ha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second applicant's intentions and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contract had been terminated, she had in fact made her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 review. Miss Dee further stated that upon receipt of that letter the department was ready and willing to consi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second applicant's case, and indeed has since done so with the result described above.

Bearing in mind the clear and undisputed need to deal with the abuses by the F.D.H. described above, their Lordships are quite unable to accept that the new policy, because it involved this increase in the women's vulnerability, can be categorised as so outrageous in its defiance of logic or of accepted moral standards that no sensible person who had applied his mind to the problem would have made such a decision.

Uncertainty

The two-week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F.D.H. must either pack up and leave Hong Kong, or alternatively enlist the assistance of the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as the two applicant's successfully did,

1988 WL 624537 (Privy Council), [1988] 1 W.L.R. 919, [1989] 1 HKLR 233, (1988) 85(31) L.S.G. 35, (1988) 132 S.J. 1118, [1988] HKLY 13, [1988] HKLY 532, [1989] HKLY 27, [1989] HKLY 597

(Cite as: [1988] 1 W.L.R. 919)

begins to run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Mr. Scrivener submitted that it might on occasions be very difficult to establish when the contract terminated and therefore the girl would not know when she was at peril of committing a criminal offence: see section 41 which provides that any person who contravenes a condition of stay in force in respect of him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be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5,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two years. Their Lordships consider that there is an air of unreality about this contention. These contracts of employment, generally speaking, terminate by effluxion of time, as a result of a notice of termination being given, by mutual agreement or by the woman walking out of her employment or being shown the door. Of course, the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contract concerning discharge by *930 breach may permit of nice questions which have yet to be finally resolved as to the effect of unaccepted acts of wrongful repudiation involving the relationship of master and servant. While making due allowa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such cases, in practice they will arise extremely rarely. The uncertainty which they are capable of creating cannot have the effect of rendering the new policy so unreasonable as to amount to an abuse of power and therefore ultra vires.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e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deal sympathetically with such cases. Moreover the F.D.H., who finds herself in this rarefied realm of uncertainty, can take comfort from the knowledge that the burden will lie upon the prosecution, if the authorities are minded to prosecute, to establish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at she has remained for longer than two weeks in Kong Kong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reasons stated above their Lordships will humbly advise Her Majesty that this appeal should be dismissed.

Representation

Solicitors: Philip Conway Thomas & Co.; Macfarlanes.

S. S.

(c) Incorporated Council of Law Reporting For England & Wales

END OF DOCUMENT

誓章/誓詞

第 8(1)條 授權的申請

ICSO

號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第 XXX 章)

(第 8(1)條)

截取/第 1 類監察*授權申請書

AAA 的誓章/誓詞*

本人 AAA，為香港警務處[總督察]，謹宣誓並聲言/謹鄭重及至誠確認*如下：

2. 本人為香港警務處人員，即[**香港警務處刑事情報科**]的[**總督察**]，因此合資格根據《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條例”)(第 XXX 章)申請就第 1 類監察的授權。本人謹此宣誓/確認*本誓章/誓詞*，以支持根據條例第 8(1)條對授權的申請。這項申請已獲[**刑事情報科總警司**](香港警務處首長級人員)批准。就我所知所信，本誓章/誓詞的內容全部屬實，即所作供的事實及事項是本人所知悉的，或是以參與這項調查的同事向本人提供的資料作為依據，而本人確信該等資料屬實。

*請刪去不適用者。

申請目的與相關調查

3. 此項對第 1 類監察的申請，旨在防止或偵測嚴重罪行/~~保障公共安全~~^{*}。基於上述事實及其他資料，本人有合理理由懷疑 BBB 和 CCC 的其他幹事即將觸犯“參加三合會社團的集會”和“管理三合會社團”的罪行，違反分別最高可處 3 年和 15 年監禁的《社團條例》（第 151 章）第 20(2)和 19(2)條。

4. 此項申請就九龍彌敦道 36 至 44 號重慶大廈二樓 A 座 Ho Ho Restaurant，與 **[BBB 陳大文香港身分證號碼 123456(7)]** 有關。此次是第二次就**[BBB]**根據該條例提出的申請，對上一次在 2006 年 1 月 1 日由刑事情報科總警司批簽申請，涵蓋期間為 2006 年 1 月 2 日至 2006 年月 31 日。

5. 此項申請是基於以下事實和理由。

6. 我們接獲情報指 BBB 是 CCC 三合會的龍頭大哥，而他將於 2006 年 6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6 日期間，與其他頭目舉行多次三合會會議，商討即將舉行的接班人選舉事宜。我們有證據顯示 CCC 三合會在國際販毒和偷運人蛇活動方面十分活躍。

第 1 類監察的形式、地點和時限

7. 擬採取第 1 類監察的形式為採用視光及監聽器材，以期辨認身為三合會會員的目標人物，並監聽他們在酒樓私人房間（相信是開會地點）內的談話。根據情報，有關會議會在 2006 年 6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6 日舉行。本人認為，不能以侵擾程度較低的方法謀求達到此項目的。

相當可能會藉進行該第 1 類監察而取得的利益

8. 本人相信，該第 1 類監察相當可能提供將會出席三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合會聚會的所有高層頭目的身分及有關即將舉行的選舉及他們的有組織販毒及偷運人口活動的談話細節，有助調查涉及 BBB 及其同黨的個案。

該第 1 類監察對受其影響人士私隱方面的影響

9. 就監察對象或受第 1 類監察影響的任何其他人士的私隱受到影響的可能性，會盡量減低至就調查所取得的證據及資料是必須的。取得的資料不大可能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或涉及任何新聞材料。

是否可以侵擾程度較低的手段繼續調查

10. 疑犯所涉及的行為類別是秘密進行的，而且一般侵擾程度較低的調查方法無法滲透參與者為保護自己免受執法機關調查而設立的防線。參與者均極為警覺。

11. 本人因此立此誓章/誓詞*，以支持本人根據條例第 8(1)條就第 1 類監察的授權提出的申請。

於 2006 年 5 月 27 日)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原訟法庭發誓/宣誓*)

簽署

[香港警務處刑事情報科總督察 AAA]

在本人面前進行

(司法機構監誓員)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誓章/誓詞

第 8(1)條 授權的申請

ICSO 號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第 XXX 章)

(第 8(1)條)

截取/~~第 1 類監察~~*授權申請書

AAA 的誓章/誓詞*

本人[AAA]，為廉政公署[首席調查主任]，謹宣誓
~~並聲言~~/謹鄭重及至誠確認*如下：

2. 本人為廉政公署人員，即廉政公署首席調查主任，因此符合資格根據《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條例”)(第 XXX 章)申請就截取的授權。本人謹此宣誓/確認*本誓章/誓詞*，以支持根據條例第 8(1)條對授權的申請。此項申請已獲執行處助理處長[XXX 先生](廉政公署首長級人員)批准。就我所知所信，本誓章/誓詞的內容全部屬實，即所作供的事實及事項是本人所知悉的，或是以參與這項調查的同事向本人提供的資料作為依據的，而本人確信該等資料屬實。

*請刪去不適用者。

申請的目的及與申請有關的調查

3. 此項截取申請旨在預防或偵測嚴重罪行/~~保障公共安全~~^{*}，即一間上市公司一名高級行政人員及兩間基金公司多名財務分析員涉嫌干犯《防止賄賂條例》第 9 條所訂的接受或提供利益罪行。

4. 此項申請是基於以下事實和理由。

5. 調查的目標人物是 X 先生，香港身分證號碼[]，他是香港證券交易所一間上市公司 ABC Pty 有限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廉政公署有資料令人合理懷疑 X 先生意圖賄賂或已提出賄賂以香港為基地的兩間基金公司的兩名財務分析員，作為他們撰寫有利該上市公司股票盈利能力的報告的報酬。情報顯示，賄款金額約為數百萬元，以現金支付，並以認股權掩飾。初步調查顯示，該上市公司正考慮透過配股籌集資金，而令配股對市場具有吸引力，必須將股價保持在某水平以上。該兩名財務分析員(身分仍未知悉)已答允在此宗操控股價的詐騙案中合作，但希望與該名高級行政人員會面，商討計劃。當局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們會在未來兩星期內會面，但不知道會面時間和地點的詳細資料。此項對截取的訂明授權的申請，是就該上市公司高級行政人員的通訊而作出的。

6. 本人並不知悉，以往曾有就目標人物或本人此項申請所述的任何人士提出申請。

該截取的時限及擬截取的通訊

7. 我們擬截取該高級行政人員所使用的下述通訊服務：

(i) 位於[]處所的辦事處的電話號碼[]

(ii) 流動電話號碼[]。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參與者的刑事行為必須在配股前作出，而預期配股會在 [] 進行。因此，現就直至配股日期及配股日期後一星期的期間尋求授權。

相當可能會藉進行該截取而取得的利益

8. 我們相當可能會從該截取取得有關疑犯貪污活動的情報。這些情報應會包括涉及詐騙案的所有人士的身分、每名參與者的角色詳情，以及他們因合作進行貪污活動而從該高級行政人員收取的報酬。

該截取對受其影響人士的影響

9. 只有該高級行政人員使用該等電話線。據悉，目標人物使用該項設施處理其業務，但也可能用來辦理私人事務。除該高級行政人員與懷疑涉案的財務分析員的通訊外，目標人物與在生意上有聯絡的人士(身分不明)的通訊也可能會被截取。

10. 本人沒有理由相信，藉此項秘密行動可能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

11. 本人沒有理由相信，藉此項秘密行動可能取得新聞材料。

是否可以侵擾程度較低的手段繼續調查

12. 初步調查已經展開，但未能取得進一步線索，以確定該高級行政人員與有關財務分析員會面的時間和地點，以及該等分析員的身分。沒有侵擾程度較低的其他手段可讓調查人員達到所謀求達到的目的。

13. 本人因此立此~~誓章~~/誓詞*，以支持本人根據條例第8(1)條就截取的授權提出的申請。

* 請刪去不適用者

於 2006 年 6 月 14 日)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原訟法庭發誓/宣誓*)

簽署

廉政公署首席調查主任[AAA]

在本人面前進行

(司法機構監誓員)

* 請刪去不適用者